



“有船吗——”“船来啦——”根据潘长江《过河》改编的小品，是吉庆街点击率颇高的节目。作为吉庆街的“新四大天王”之一，“一撮毛”刘亚东每天晚上都要和妻子贾爱兰一起为食客演好几遍《过河》。

刘亚东，艺名“一撮毛”，河南人，1967年生。2001年，他到吉庆街卖艺，擅长川剧变脸、小品、豫剧、二人转、唢呐、芦笙，与“老通城”“麻雀”“莫妮卡”一起并称为吉庆街“新四大天王”。刘亚东的妻子贾爱兰，1964年生，擅长豫剧、二人转，与刘亚东一起在吉庆街卖艺，是绝佳的演艺搭档。儿子刘辉也在吉庆街唱摇滚。一家三口就住在附近的一处出租屋里。

刘亚东夫妇曾是河南某专业剧团的演员，后因剧团不景气，为了养家，只好出来卖艺。刘亚东从留着小平头、只会表演豫剧的腼腆小伙子，到剃成一撮毛、唱念做打表演自如的“天王”，只有他自己知道，付出的心血比泪水更多。夫妻二人每天凌晨1点左右才回家，烧水、做饭、吃饭、洗澡，直到早晨6点才能上床睡觉。有一次表演空翻时，“一撮毛”左手撑到地上一片玻璃碰上，鲜血顿时流出来，可他像没事似的，坚持把节目演完。他说：“虽然咱是卖艺，但要对得起观众才行。”图为2011年国庆节期间，刘亚东和贾爱兰为食客表演二人转。

2014年11月，因贾爱兰腿疾久治不愈，刘亚东陪妻子回老家治病，从此与吉庆街挥手告别。

(图/文 周国献)

目录

编委会名誉主任：谭仁杰 彭富春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心耀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陆永初 涂文学 萧志华 彭小华
董宏猷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编委会副主任：陈 光 朱向梅
杨 华 李修文
陈国方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尹 鹏 甘 琼 龙桃仙 吕照清
刘重武 邹仕芳 张 霞 陆建军
陈立新 姚四平 曾艳红 窦 梅
潘红莲

主 编：陈国方

副 主 编：周 敏

本期责任编辑：华 蕾

编 辑：张川蕾 游 迎

封面设计：王 鹏

城市之根

<<< <

- 4 《盘龙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编制历程 / 郭学玉

扶贫路上

<<< <

- 10 本是扶贫老兵 再书抗疫新传 / 晏三治
14 放下身段融入村民中 动起手来帮扶贫困户
/ 朱国海

精工匠心

<<< <

- 18 我和我的扁担工会 / 钟思利

山有赏门

<<< <

- 25 难忘风雨同舟情——忆陶军 / 章开沅
31 我与民大的片断回忆 / 章绍刚

武汉文史资料

WUHAN CULTURAL & HISTORICAL DATA

CONTENTS

2020年第5期(总第331期)

委员天地

<<<<

- 36 建言博物馆建设的链式反应 / 邓超华
42 在“人民大学”中倾听与思考——我的社区抗疫叙事
/ 杨德红

往事漫忆

<<<<

- 46 汉阳有个两湖商店 / 邵清泉(口述) 邵碧玲(整理)

文史随笔

<<<<

- 53 汉味糯食小吃盘点 / 罗建华

楚风汉韵

<<<<

- 57 昙华林·校园记事 / 徐勇民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达印刷厂

出版日期：每月28日

定 价：8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246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 82220667

(027) 82220669(传真)

E-mail: whzxwsl@163.com

《盘龙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编制历程

◇ 鄂学玉

盘龙城遗址是我国长江中游地区首次发现的商代早期城市遗址，距今已有 3500 多年的历史，也是迄今我国发现的同时期保存最好的城址之一。它以蕴藏丰富的青铜文化和暴露在地面之上的方形城垣遗存而闻名中外，入选中国 20 世纪 100 项考古重大发现。

为了更好地保护好、利用好盘龙城遗址这一不可多得的宝贵文化遗产，武汉市政府经过不懈努力，多方争取，在 2000 年实现盘龙城遗址由湖北省移交给武汉市管理。市政府设立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筹建处，并由我来担任筹建处主任。到任不久，我就经历了影响盘龙城遗址长远文物保护工作的《盘龙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起草出台全过程。在此记之，以示纪念。

（一）

考古与保护，在国家大遗址保护工作中是一项首要任务。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筹建处成立后，市政府交办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考证武汉建城年代史的综合科研项目。在市文化局领导下，我们联合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 2000 年发掘了盘龙城遗址南城壕，提取了重要的碳 14 测年标本；2001 年对盘龙城遗址边缘进行勘探，发现了 800 多米长的外城墙遗迹。2002 年召开的“商代盘龙城与武汉城市发展研讨会”，与会专家吸纳了我们前两年的考古成果，经过论证，认定 3500 多年前的盘龙城遗址是“武汉城市之根”。

2002年，市政府批准设立了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盘龙城遗址处于开发区腹地，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我们在保护好遗址的基础上可以充分发挥文物资源优势，通过文化旅游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但难点是如何协调处理好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为了保护“武汉城市之根”，编制《盘龙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当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根据我们得出的最新考古成果重新划定遗址保护区的范围。外城墙遗迹等重要遗存的发现，使得盘龙城遗址的范围远远超过湖北省政府2000年发布的盘龙城遗址1.1平方公里保护范围。若继续按原来的保护范围，势必影响到盘龙城遗址的完整性，必然造成遗址的破坏；如要扩大保护范围，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的地产开发、工厂和商业等经济发展又将受到严重影响。

第二个问题，是遗址保护与村民生产生活的矛盾。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占用的土地一律维持现状，不准增建住宅或任意扩大村庄占用面积。居住在盘龙城遗址上的叶店村村民生产生活受到了诸多限制，只能进行传统的种植、养殖，不能有任何动土建设。当地村民有着发家致富、发展经济的诉求，但为了盘龙城遗址的保护而作出了不小的牺牲和贡献。要实



2006年，为配合盘龙城遗址保护规划编制而开展的考古工作

现保护遗址和村民致富的双赢，就必须对遗址保护范围内的村民进行搬迁安置。

以上问题，引起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2002年5月26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李宪生来到盘龙城遗址实地考察，现场指示要规划先行，妥善处理好遗址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好区内居民搬迁工作。

（二）

盘龙城遗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保护现状来之不易，但具体保护工作千头万绪。

早在1994年，市政府就组织编制了《盘龙城遗址风景区保护开发规划》，划出10.94平方公里的文物保护区和风景区控制范围，为有效保护盘龙城遗址奠定了基础。但2000年以后，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和遗址考古保护现状都和以前不同，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编制盘龙城遗址保护规划，要从头开始，摸索前进。

2003年，国家文物局正在组织专家编写《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规划编制审批办法》和《编制要求》，为“十一五”期间做好大遗址保护工作打下基础。编写期间，国家文物局选定保护工作基础较好的30处国保单位编制遗址保护规划纲要，盘龙城遗址被列入其中。契机出现了。武汉市文化局很快组织专家，于当年8月完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盘龙城遗址保护规划（2003—2020年）》的建议稿。

2004年4月，市长李宪生和市委副书记殷增涛带领市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盘龙城遗址实地调研。李市长很重视对盘龙城文物的保护工作，市里专门成立了由市委副书记殷增涛任组长，宣传部长车延高、副市长刘顺妮任副组长，市有关部门和相关单位负责同志组成的盘龙城遗址保护开发工作协调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和解决盘龙城遗址保护开发工作中的问题。根据李市长的重要指示，市文化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物保护法》的规定，结合盘龙城遗址现状，建议盘龙城遗址文物保护区面积由1.1平方公里增至4.2平方公里左右，即在北起童家嘴的盘龙湖北岸，南抵府河大堤，东至长峰港的盘龙湖东岸，西至甲宝山的范围内，确立了遗址保护规划的参考范围。

2004年年底，商代盘龙城遗址保护规划项目在国家文物局正式立项，纳入全国“十一五”大遗址保护重大项目库。2005年7月，市政府在盘龙城遗址保护开发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专班，负责规划制订工作，拨付规划专款100万元。市文化局为此专门成立规划工作小组，具体负责规划制订工作。2006年1月，市政府发布的《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总体规划》将盘龙城遗址保护、盘龙城遗址公园建设列入其中，并将其作为2006年政府一级工作目标。在市委、市政府的前瞻谋划和高度重视下，工作专班对于协调好有关各方面的关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根据国家文物局建议，选定具有编制资质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并迅速与之取得联系。当时全国各地找他们做文物保护单位规划的单位太多，工作十分紧张。经过多次协商，2005年10月，对方终于接受编制《盘龙城遗址保护规划》并签订了委托协议。2006年3—4月，



2006年12月召开的《盘龙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定稿会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王力军副所长等专家对盘龙城遗址进行实地考察，并与市文化局、市建委、市规划院等相关单位的专家座谈，听取对盘龙城遗址保护规划编制的意见，初步形成了规划思路。

考古工作是编制盘龙城遗址保护规划的基础。自2005年12月至2006年7月，为配合规划的编制工作，我们组织专业考古队伍对盘龙城遗址周边地区15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和重点部位试掘工作，并与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物理与空间信息学院合作，对盘龙城遗址区域进行综合地球物理勘测，基本上摸清了盘龙城地区文物分布基本情况。根据以上工作，并结合历年来积累的考古资料，我们向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提交了《盘龙城商代遗址分布情况分析》及其附图，这是确定盘龙城遗址文物保护边界范围的最重要依据。

2006年3月，国家文物局与财政部派员到湖北考察大遗址保护工作，在省、市文物部门负责人陪同下，专程考察盘龙城，确定将盘龙城遗址作为大遗址保护与展示的重点项目。为加快进度，4月初，省文物局决定成立“盘龙城大遗址保护与展示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省文化厅副厅长、文物局局长沈海宁任组长，市文化局副局长郑自来任副组长，省、市有关方面的处室负责人与盘龙城遗址的负责人为工作组成员，办公室设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筹建处。省文物局盘龙城专项领导小组的成立，使省、市在盘龙城遗址保护上形成了合力。沈海宁与郑自来同志几次亲自到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与相关方面协商，得到大力支持，盘龙城遗址保护项目工程获准立项。

为了做好规划，我们与规划编制单位、

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及有关方面，进行认真细致的协商，重点解决文物保护与经济开发的矛盾。期间，我们也多次到北京向国家文物局汇报，得到国家文物局领导、文保司领导的及时指示，给我们的工作以极大的指导和推动。2006年6月，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按照要求提交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盘龙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年）》的讨论稿。

7月4日，市文化局组织省、市部分文博专家在武汉革命博物馆会议室召开了文博专家咨询会，对讨论稿进行了评议，专家们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会后规划编制单位视情况作了修改。一个月之后，规划编制单位王力军等人来武汉听取意见，在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举行《盘龙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咨询会。省文物局、市文化局、市建委、市发改委、市交委、市林业局、市园林局、市规划局、黄陂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区属各局、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筹建处等单位负责人和专家出席了会议。会议确定盘龙城遗址保护范围控制在4.68平方公里左右，要求规划编制单位根据最新的考古工作成果对保护范围等进行修改。

为使规划更具科学性与可操作性，9月15日，省、市文物部门会同黄陂区，派员专程前往北京征求专家意见。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李伯谦先生充分肯定了我市对盘龙城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指出划定保护范围的关键是必须以考古勘探资料为依据。为全面充分掌握盘龙城遗址遗存分布情况，我组织本单位专业人员在湿热的天气里埋头钻进档案室，全面梳理了堆积如山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资料，于9月28日向规划编制



《盘龙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07-2025）》文本

单位送交了《盘龙城商代遗存情况分析》，使保护范围的划定更加有据可依。

10月上旬，规划编制单位再次来到盘龙城协商，然后依据我们提供的盘龙城商代遗存分布图，对一般保护区、建设控制区、环境控制区的范围做了进一步修改，总规划面积为15.70平方公里，包括遗址保护区4平方公里、建设控制区2.42平方公里、环境控制区9.28平方公里。11月6日，以省文物局局长沈海宁为组长的盘龙城规划工作组在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召开会议，再次对《盘龙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修改稿进行讨论，指出在盘龙城遗址保护范围总面积不变的情况下，依据文物保护法和国家文物局有关意见，以及《武汉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年）》等，从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统筹考虑、科学规划盘龙城遗址具体保护范围。之后，规划编制单位将总规划面积调整为15.76平方公里，包括遗址保护区3.95平方公里、建设控制区2.60平方公里、环境控制区9.21平方公里。

经过近一年艰苦但有效的协调、沟通、磨合，最终各方在尊重考古工作成果的基础上达成共识，重新划定了盘龙城遗址保护范围，即由原来的1.1平方公里扩大到3.95平方公里，范围北至巨龙大道以南400米，东至长峰港、盘龙湖东岸一线，南至府河现河道北岸，西至盘

龙大道，其中重点保护区1.39平方公里，一般保护区2.56平方公里。盘龙城遗址的完整性得到了有效保护。

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负责本规划编制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王力军副所长在规划编制完成后，深有感触地说：“我做全国大遗址保护规划十几个，像盘龙城这样协调得好的还是第一个，它所包含的宝贵经验，具有典型意义，值得向全国推广。”

（三）

2006年12月26日，市政府召开盘龙城遗址规划专项会议，市领导车延高、刘顺妮等出席会议，会议原则通过了该规划，之后上报省文物局。

2007年3月8日，省文物局召开盘龙城遗址规划专家评审会，专家评审组对规划评价很高，同意上报国家文物局。3月23日，市文化局郑自来副局长率队到国家文物局，

全面汇报了规划编制情况。国家文物局文保司司长关强对湖北省和武汉市所做的工作十分肯定，他指出：“把盘龙城遗址调整为国家重点支持项目，排在湖北省大遗址保护第一位，就是基于武汉市政府的重视和遗址周边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如何做好保护，完成总规是第一步，今天，你们送来了好消息，历时一年，总规报上来了，我们将立即组织专家，争取尽快评审批复，规划中的有些项目，可以做好实施准备。”

4月18日，国家文物局在武汉召开《盘龙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专家评审会。会议邀请了文物考古和规划方面的专家，在实地考察了盘龙城遗址现状，并听取市文化局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有关负责人关于《盘龙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07—2025年）》编制情况以及规划内容的介绍后，对《规划》进行了认真评审。省文物局、市文化局、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筹建处和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相关负责人与会。会议认为，武汉市及黄陂区人民政府对盘龙城遗址的保护工作十分重视，为规划编制以及将来保护展示工程的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会后不久，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复了《盘龙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07—2025年）》。

省文物局在根据国家文物局意见组织专家对规划进行修改后，会同省内其他8处审核通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总体规划上报湖北省人民政府。2009年4月25日，省人民政府发布鄂政函〔2009〕100号文件，批复了包括盘龙城遗址在内的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总体规划。

《盘龙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07—2025年）》编制工作经历了六年，八易其稿，得到了最终正式批复。规划批复实施之后的成果作用很快得以显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国

情调研项目组在2008至2009年调查了全国9处早期都城遗址保护现状后，认为武汉盘龙城遗址由于及时制定了保护规划，加上地方政府对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力度强，是保存状况最好的。

市委、市政府把盘龙城遗址保护纳入到武汉市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乡总体规划之中，使盘龙城遗址的文物保护工作走上了法治化管理轨道，在处理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城市发展、合理利用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之后，盘龙城遗址保护展示工作进入了快速建设阶段，如今已建成开放了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盘龙城遗址博物院。3500多年的盘龙古城，武汉城市之根，焕发新的活力，已成为武汉市一张亮丽的历史文化名片。

（鄂学玉：原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筹建处主任）

本是扶贫老兵 再书抗疫新传

◇ 晏三治

2020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人们原有的工作、生活节奏，武汉人民纷纷投入到抗疫情的战斗中。我所负责的精准扶贫工作也因此受到了较大的冲击。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同时抓好疫情防控和精准扶贫两项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我是山里长大的孩子，高中毕业入伍并在军事院校就读四年，1985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营职主官位置上荣立三等功，22年的军旅生涯形成了我坚毅果敢的性格。2001年年底，我转业到武昌区工商局，因工作需要，2009年调任武昌区民政局，负责区对口扶贫工作（区扶贫办设在民政局，后转区政府办），直接参与小康工作队、“三万”活动和精准扶贫至今。10年的扶贫工作生涯让我对扶贫事业充满了特别的情怀，本质上与农村和农民有着自然的亲近。为了增强与村民的友情，我第一步

就是学会当地“土话”并融入其中，我熟悉他们的语调，也熟悉他们眼神，在村民中间其乐融融，成为23个贫困村的“荣誉村民”，他们都叫我“晏老乡”。我深知要彻底脱贫致富，搞产业是出路，在贫困村要把扶贫产业作为重要抓手。为此，我对帮扶村的大小63个产业项目如数家珍，熟知起始和现状，人称产业项目的“活档案”。

疫情防控奔一线

我本已临近退休，可以无怨无悔地搞好收尾工作，并业已受邀到战友的房地产公司负责工会工作。但疫情突发，打乱了我心中扶贫工作冲刺收官的规划。如何做到抗疫、扶贫两不误，成为摆在我面前必解的课题。疫情期间，令我颇为揪心的是武昌区对口帮扶的423户1367名贫困人口的生活，他们吃得饱不饱、穿得暖不暖、防护是

否到位、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的生活有没有保障等，让我好不牵挂，保障好贫困户的生活成为我最急迫的心愿。我就像1996年、1998年投身抗洪抢险一样，拿出攻坚克难的勇气，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迎难而上。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重要讲话精神 and 省、市、区“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一手抓抗击疫情，一手抓脱贫攻坚，两场都要全胜”的要求，我一

方面投入到疫情防控总体战当中，另一方面深入开展扶贫攻坚战，时刻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全力以赴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用实际行动践行一个具有35年党龄老兵的初心使命，用勇往直前彰显扶贫干部的责任担当。

在防疫物资最紧缺的时期，考虑到贫困户可能缺乏防护用品，我和单位的同事们积极协调各方资源，为23个对口扶贫村筹集了第三批防疫物资，其中口罩2.25万只、酒精和消毒液2800瓶、手套1.2万双、中药1806盒、体温计1300支，为贫困村14岁以下留守儿童送去28件牛奶，同时将“致贫困户的一封信”递送到423户贫困户手中，从精神和物质上全方位帮扶抚慰贫困户。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武昌区对口帮扶贫困人口1367人无一人感染，脱贫贫困户无一户因疫返贫。

在驻村工作队员全员进驻时，为了确保返村的91名队员健康上岗，我积极协调医疗机构为驻村工作队员做防疫检测，让队员放心，让贫困户安心。为落实好中央、省、市扶贫工作精神，我组织各工作队加强学习



2019年12月11日，晏三治（右）走访看望新洲区三店街施阳村2组贫困户宋普国（中）

领会，积极发动党员、村干部、返乡有志青年加入到疫情防控宣传、卡点值守、道路封控、购药送医等工作中，为复工复产打下良好基础。

广开销路保供给

疫情期间，为解决武昌区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新鲜农产品蔬菜供应紧张的问题，前往扶贫村了解63个扶贫产业项目的经营状态成为了我的工作常态；产业现阶段的拓展、产品质量的保障、产出利益的分配、用工人员的防护、科普和技术提升、持续规划，尤其疫情期间的农产品销售等等都是要上心的事，因为这是关系到每一名贫困户切身利益的事情，必须慎之又慎。为此，我走访了乌钵窑村、桃花寨村、将军山村、李旻村、竹园村等23个村，对扶贫产业发展状况做了认真摸底并着手进行。比如，帮助依托扶贫产业成立的专业合作社“武旻合作社”召集当地30余名村民、12户贫困户15人，加班加点奋战70余天，累计抢收了

农产品及蔬菜 110 万斤、牛肉 1000 余斤、鸡蛋 1925 枚，价值约 120 余万元，每日向中心城区转运放心蔬菜，第一时间送往协和医院、武昌方舱医院、天佑医院、省肿瘤医院等 10 多家医院及武昌区社会福利院、武昌区阳光福利院、胭脂路社区民康养老院等 28 家福利养老机构，为其提供坚强的后勤保障，确保相关机构在疫情防控期间的正常运转，及时保障医务人员、特殊困难群体的生活需要，同时也为当地农产品拓宽销路。

消费扶贫不停步

我深知，脱贫攻坚还在路上，抗击疫情更应显担当，要在扶贫路上搭建好“连心桥”。受疫情影响，部分贫困村的农产品出现了积压滞销的情况，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绞尽脑汁想办法。我利用电商平台、微信群等帮助他们解决农产品销路难问题，创新线上预约、线下派送的消费扶贫模式。4 月中旬，得知武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要对参加一线抗疫的退伍军人进行慰问，我立即为其调度送去土鸡蛋和新鲜蔬菜 1408 份，价值 8.5 万元。在我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武昌区内 53 家机关、社区、小区，发动机关干部、社区群众、小区居民购买，既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也提高了贫困户的收入。截至 4 月下旬，已推进消费扶贫线上销售乌钵窑村的羊肚菌、桃花寨村的蘑菇、李旻村和竹园村的蔬菜以及鸡鸭、

牛肉、猪肉、鸡蛋等农副产品，销售额达 50 余万元，增加了 23 个对口贫困村效益的同时，也为下一步扶贫产业项目的提升做好铺垫。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作为一名转业军人，虽然从部队的战场上退下来了，但依旧在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上拼搏。我时常告诉自己：“要永葆军人政治本色，不怕苦，不怕累，我必须和扶贫战线上的战友们一起冲锋陷阵，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和疫情防控阻击战。”我一直认为，只有心系村民的生活和健康保障，热衷于扶贫工作，努力让贫困户获得满足感和幸福感，才能尽好一名扶贫干部该尽的责任。我的扶贫对象中有一位 70 多岁的爹爹讲了句心里话，也代表了我们的理想追求：“日子越过越好，甜得不得了，我真的好想活到 100 岁。”

复工复产保收效

2015 年，按照省、市精准扶贫工作要求，武昌区对口扶贫新洲区三店街 16 个村和徐



2020 年 2 月 21 日，晏三治（中）为对口帮扶的新洲区三店街 16 个贫困村送防疫物资

古街7个村。23个贫困村共有423户、1367名贫困人口。抗击疫情期间，我们帮扶村的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忙得团团转——杨岗村里的苗圃要下种苗，懂春村的鱼塘承包马上就要招标，蔡河村的“四好”公路要动工，竹园村的300吨蔬菜冷库要建设，杨湾村的90亩土地要流转种果苗等等，千头万绪。为了让复工复产顺利开展，我

下村调研走访10余个村，并协调相关部门和街道解决资金投入和政策落实问题，同时充分利用武昌区早期投入的300万元扶贫款，按照村民和贫困户意愿落地到每一个产业项目。

按照走访调查测算，杨湾村在5、6组以流转土地形式新建90亩苗圃基地的项目实施后，可增加村集体收入1.8万元，带动贫困户8户31人，每户每年增收1200元。院墙村150亩土地流转种植经济作物小香薯，搭建10个大棚，预计投入种苗10万元，该项目实施后，可保障常年用工20人，带动贫困户5户19人，每户每年增收2000元。竹园村新建容量300吨的冷库一座，工程完成后，能持续为村集体经济创收28万元，带动8户贫困户劳动力务工增收2万元。

2020年五一小长假期间，我查看了新洲区三店街李旻村扶贫产业蔬菜种植基地，发现几十亩的毛白菜和茼蒿疯长，再不处理就废在地里了。我立即协调驻村工作队召集村民抢收快运，从5月1日到5月5日捐赠1.2万斤给武昌区粮道街、民主路、巡司河、楚材社区等地的28家养老院和两家为防疫一



2020年3月9日，晏三治（左）从新洲区三店街和徐古街筹集的蔬菜运抵武昌区

线工作人员提供免费餐饮的食堂。按照“两不愁三保障”标准，武昌区扶贫办及时将第5期“农夫集市”调整到线上进行，全面推进“春季攻势”，聚焦重点，明确时间，防范风险，拿出过硬举措办法，实施针对性措施，坚持一户一策，集中财力和人力有序推进。在对口帮扶人口全部脱贫的基础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莫嫌海角天涯远，但肯摇鞭有到时。”作为一名扶贫干部，我感到重任在肩头，使命在心间。必须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和勇气与当地干部群众团结一道，全力以赴抓好疫情防控、驻村帮扶等各项工作。

支撑每一个驻村干部默默付出和真心守候的精神力量，正是那份为民解忧、为国分忧和“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笃定信念，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取得疫情防控和精准扶贫的双重胜利！

（晏三治：武昌区扶贫协调中心主任）

放下身段融入村民中 动起手来帮扶贫困户

◇ 朱国海

(一)

2018年4月,受江汉区民族街工委的委派,我来到黄陂区长轩岭街赵畈村开展驻村扶贫工作。如何有效地开展扶贫工作,我心里完全没有一点底。唯记得来村前的培训班上领导讲到的:学习、学习、再学习,入户、入户、再入户。想想也对,只有沉下心来,在学习理解扶贫政策的基础上,上门入户宣传才能有效;只有在了解村情和户情后,放下身段融入村民中,动起手来帮扶贫困户,才能有效地开展扶贫工作。

到村后,我听了村主任的情况介绍,得知赵畈村位于黄陂区北部,地理位置较为偏远,是长轩岭街重点贫困村,离主要公路较远,交通也不方便,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为

零,18个自然湾分散在6平方千米的范围内;户籍人口1709人,但村常住人口只有576人。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61户、168人。

为了掌握真实情况,白天,我和同事拿着《扶贫手册》逐户走访在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对照档案问清其家庭住房、承包土地、主要收入来源、日常做什么、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等;对在外打工的贫困户房屋等进行拍照,记清地址,同他们建立电话联系,了解情况。晚上,又对着贫困户档案逐一分类,如五保贫困户、低保贫困户、一般贫困户等。三周过去了,我和同事走遍了全村18个自然湾,对全村61户贫困户的基本情况有了直观的了解,对他们的住房情况更是印象深刻。

了解了贫困户家庭情况后,如何开展扶贫是摆在我面前最大的一个问题。

在入户走访过程中，我听说本村青年陈伟回村创办了一个家庭农场。为了作进一步了解，我们多次上门与他交谈，得知他想扩大农场规模，但缺少资金。当时街里正实施“三乡工程”，其中一条就是支持“能人回乡”。我就想，能不能以陈伟的家庭农场为抓手，帮助投入一点资金，把农场规模扩大一些，并以此作为在村创业的“示范点”，让村民知道在村里也是可以创业致富的。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就向长轩岭街扶贫办领导作了汇报。

我的想法得到了街扶贫办的支持。于是我们用帮扶资金，以村委会的名义向陈伟的家庭农场投资10万元。双方约定，陈伟每年向村里返还1.5万元作为村里投资的回报，三年后向村返还10万元投资款。同时要求陈伟在用工上优先聘用村里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对于村里及时的资金帮助，陈伟非常感谢。当月他就将农场里的8只小羔羊送给本村贫困户王四文放养。2018年年底，陈伟按约定向村里返还了1.5万元，村里也有了小收入。同时，按小羊的重量回购了王四文养的8只羊。这样一来，王四文一家当年经济上增收2000多元。看到了增收的希望，王四文又提出要养200只鸡，陈伟向他无偿赠送了100只鸡苗。我们将这个情况向其他贫困户作了宣传，贫困户雷国平也有了养鸡的想法，于是陈伟也向他赠送了100只鸡苗。2019年，陈伟的家庭农场代王四文销售土鸡蛋和土鸡收入共计8000多元，着实惊喜了王四文一家；雷国平家的鸡蛋也卖了2000多元。我们以帮扶本村青年“回乡



2018年5月，朱国海帮贫困户整秧田

创业”为抓手，村里部分贫困户通过劳动增收脱贫，起到了示范作用。我计划在村里大力推广这一做法，让贫困户家庭经济上多一条增收的路。

（二）

经常入户走访，我也亲眼看到有些贫困户生活确有困难。于是，在我的提倡下，赵畈村率先办了一间“爱心超市”，民族街、区司法局、区生态环境保护分局、万商白马商会，以及武汉361°服饰公司等单位纷纷捐赠衣服、鞋子、被子、雨伞、手杖、小孩玩具、书包、书籍、文具等物品作为超市的货品，根据贫困户家庭的需要将实物送上门。一年多来，该超市为贫困户送去了400多件（套）物品，受到了村民的好评。

2018年10月，在收到市扶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武汉市精准扶贫“爱心超市”实施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后，我们对开办“爱心超市”更有信心了。在长轩岭街扶贫办支持下，我们对村“爱心超市”

场所进行了整修。根据文件精神，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用“扶贫”与“扶志”相结合的方法，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发挥“爱心超市”作为社会扶贫网爱心物资的对接服务点、积分换物资的兑换点、扶贫政策的宣传点和农村“三风”建设载体的功能，我们制定了“爱心超市”管理办法，把参加村公益活动的次数和遵守“村规民约”作为奖励积分，再用积分换取超市里的货品，从而帮助贫困户逐渐消除“等、靠、要”的思想，净化了村里的风气。

市扶贫办领导几次来我村检查指导工作，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以市扶贫办名义向我村“爱心超市”赠送了价值2万元的货品，鼓励我们要成为长轩岭街的示范。我们按照相关文件精神，把超市重新规范，



2019年6月，朱国海（右）在村扶贫项目“油茶基地”查看油茶长势

加强管理，扩大服务对象范围，更好地服务村民。

“爱心超市”按照我们的制度实际运作后，的确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以前，谁都不愿意报名参加村里的义务消防队，现在通过给“积分”的奖励，村里的义务消防队有固定的三名队员，工作的积极性更足了。疫情期间，赵畈村的“爱心超市”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大作用。

（三）

发展产业，增强自身“造血功能”，才能扶贫解困、治标固本；没有产业，就没有收入，脱贫只会一时，不会长久。联想到赵畈村的土地优势，我认为，只有因地制宜发展适合本村的产业项目，才是一条脱贫的路。

2018年11月，我参加了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武汉农业博览会”，在会上看到一种“淮山紫山药”，它的食用和药用价值较高，且对种植土壤要求不高，市场卖出价较高，我认为可以尝试将此品种引进，并发展为赵畈村的新产业项目。于是，我在网上查证了有关资料，同时外出进行详细的考察，最后驻村工作队起草了《关于试种紫山药的方案》，详细说明了项目来源、调研情况、市场前景和种植计划，并将引进紫山药种植项目的产业发展计划向村民代表大会进行了报告，得到了广大村民代表的支持，并由本村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具体实施。

确定了工作目标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合作社多方积极筹措资金，先后与广西专业种植户取得联系，购买了紫山药种苗和浅生槽；通过电话咨询和上网查找，

学习了紫山药种植的清沟、整厢、坡度、搭架、施肥、防草等技术；对8亩多试验田进行了翻地、清沟和平整，达到了种植的技术要求，种下了1.2万余株紫山药。为了解决今后产品销售问题，驻村工作队未雨绸缪，在准备种植的同时开展产品宣传和市场推广工作，与家住民族街的江汉区政协委员联系沟通，为赵畈村取得了武汉绿森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具有所有权的、能够进大型超市销售农产品的“绿森林”注册商标的无偿使用权。

2019年虽然遇到了严重干旱，但我们种植的8亩紫山药产量也达到了近1.2万斤，每斤10元，销售很好。我村参与紫山药种植的村民也收获了种植经验，有了种植紫山药的较强意愿。下一步，我将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高劳动效率，有针对性地进行规划和推广种植。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突降武汉。我回到本单位参加隔离点的管理工作，但心里仍时时惦记着村里的疫情和疫情中的贫困户。我也深知疫情严重，村里人员肯定紧张，贫困户的生活、看病等肯定很艰难。我作为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在疫情正当时决不能缺席村里的工作。2月26日，我向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介绍了村里的有关情况，请示派人回村参与抗疫。在得到指挥部批准后，我联系相关部门，办理好相关手续，派人开车将扶贫工作队队员周军送回赵畈村，并叮嘱周军到村后，要代表驻村扶贫工作队，不要做特殊人，生活上不要有特殊要求，要克服各种困难，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坚决服从村里的任何工作安排，按相关要求积极主动地参与防疫工作。

3月中旬，村里防疫物资告急。我把该情况分别向两个派驻单位的主要领导进行

了反映，得到了两个派驻单位——江汉区民族街、区生态环境保护分局领导的支持。他们筹措了84消毒液20斤、酒精24公斤、防护服50件、防护手套100双、防护口罩2000个、测温仪2支，并且为全村61户贫困户每户购买10斤米、10斤食用油等，我和区生态环境保护分局驻村队员田勇同志一道用私家车专程送到了赵畈村。

4月2日，我返村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帮村民王大建复工，为王大建购来种子、肥料等。王大建不仅种植了50亩水稻，还种植了5亩紫山药，成了赵畈村的种植大户。我还主动帮村民“带货”，为村民推销茶叶、土鸡、鸡蛋等农产品。

驻村扶贫，我放下身段融入村民中，动起手来帮扶贫困户，历经了小山村里的春、夏、秋、冬。

春天，我不惧田中的蚂蝗，高高撸起裤腿，开着手扶拖拉机帮村民整田、插秧。夏天，我顶着烈日，与村民一道下种、除草、抗旱。秋天，收获的季节，我不顾胳膊、腿的奇痒，帮村民割稻、晒谷。冬天，我从“爱心超市”领出棉衣、棉鞋、棉被，送给有需要的贫困户。我与村民的感情近了，入户宣传的政策力度和效果更好了，调解村民的矛盾也更容易了。

脱贫是一场全国性的攻坚战，我有幸作为一名身处一线的战斗员，一定不会忘记习总书记的教诲，必将勇往直前，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朱国海：江汉区民族街办事处副调研员，驻黄陂区长轩岭街赵畈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

我和我的扁担工会

◇ 钟思利

盼入工会

我是汉正街市场一名流动搬运工，俗称“扁担”，如同重庆“棒棒军”一样属借代称呼。我们汉正街扁担这个劳动群体是伴随1979年汉正街市场开街、兴旺，因市场发展需要短途人力运输而形成的。成员主要来自农村，市场生意旺季时曾高达一两万人。

我出生于红安县高桥镇张家田村一个农民家庭，1987年高考落榜，我在家乡呆了几年，于1992年来汉正街市场当了一名扁担，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至今已有28个年头。初来汉正街市场的几年里，我们这个群体是由汉正街市场派出所管理的，每名扁担必须到市场派出所成立的保安队，凭身份证、暂住证、流动人口婚育证登记，提前缴纳马夹工本费和至少一个月的管理

费，获取一件有编号的马夹“通行证”，方可在汉正街市场从事合法搬运。否则，轻则遭保安斥为“盲流”，被没收扁担或被驱赶，重则被收容送至劳教后遣送回乡。有一名外号叫“温饱”的工友，因为平日大家问他每天收入怎样，他总是兴奋地回答解决了温饱，大家便戏称他为“温饱”。他老家是大悟河口镇，来这里干活时已快五十光景，憨厚老实，衣着朴素，因早年顶其父职，户口迁入武汉，从其所在单位长江食品厂下岗后才来汉正街买条扁担挑货维持生计。1994年11月有天下午送完货，遇上派出所查身份证、暂住证，他恰巧忘了带在身上，尽管向派出所民警解释了自己是武汉人，但由于无身份证明，仍被当作“三无”人员送去劳教了三个月才放出来。那个时候我们真正来自农村的扁担更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

大约是2003年，国务院废止了收容遣

送制度，我们工友才算松了一口气。后因全市公检法系统与经营实体脱钩，派出所及其管理的保安队不再对扁担统一管理，随即由硚口区交通局牵头成立汉正街运管办进行管理和收费。不到两年时间，全市明令禁止向外来务工人员收取任何管理费，行使管理扁担职能的运管办随之消失。此时，不少专业市场物业和物流公司

趁虚而入，未经商户许可，物业伙同物流公司垄断承包市场内商户货物搬运业务，对扁担进行盘剥压榨，按月收取数百元的管理费，甚至有按天向扁担收取二三十元管理费的，令我们工友人心惶惶。

媒体针对这些侵权行为的报道也不少，虽然最终都解决了，但我当时感觉到，我们必须依靠一个组织维权才有力量。我邀约数名工友四处奔走，渴望有个自己的组织依靠维权。2004年6月，我找到省总工会主办的杂志《工友》编辑部，表达想加入工会组织的心愿，《工友》采写了《汉正街扁担难圆组织梦》一文，发出了我们的呼声。遗憾的是，当时工会组织是吸纳有工作单位、有月工资收入的劳动者，可我们扁担流动从业、收取零散劳务费，没有与我们发生劳动关系的单位，当然也不存在月工资收入。但我们渴求入会的声音在湖北工会界引起强烈反响。

一方面，为了维护自己切身权益而渴



2006年1月23日，汉正街小商品市场16名扁担加入工会后手持会员证合影。前排左四为钟恩利

求加入工会组织，另一方面，我除了白天搬货，晚上还看看报纸，算是对社会有所了解，感觉在这个城市很孤立，像一片浮云没有归宿感，也从内心深处渴望加入工会组织，融入城市社会生活。2006年1月17日晚，《长江日报》记者梅国胜在几名工友带领下，来到我的租住地汉阳区建港路两湖后地61号，对我这名《长江日报》热心读者采写年终心愿，我对记者敞开心扉：全国总工会提出“工会是农民工之家”“农民工有困难找工会”，2004年11月8日贵报还有篇时评《别让农民工游离工会之外》，我的年终心愿就是加入工会，有个组织，这也是汉正街扁担共同的心声。记者还采访了租住在汉正街利济南路永安巷的工友康仕山，他渴望参加社区活动。当日，我要求记者用化名龚福贵，怕人笑话我在做白日梦。第二天，《长江日报》的《8个平民家庭节前调查》见报，“渴望加入工会组织”这个汉正街扁担共同的心声在这次报道中再一次公开表达出来。

喜入工会

2006年1月21日，硚口区总工会汉正街工会常务副主席周红，通过《长江日报》记者梅国胜联系我到街工会办公室解决入会问题。她说：“市总工会对你们要求入会的心愿高度重视，见到报道的当日下午，市总工会召集区总工会、汉正街工会召开了专题会议，就你们流动搬运工人入会问题紧急研究，一致决定，对有人入会意愿、工作相对稳定的流动搬运工采取特事特办的方式，在春节前批准入会。”这是我没有意料到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得太快了。第二天，偌大的汉正街批发市场几乎都已关门歇业，市场里还没回乡的扁担工友已寥寥无几，我按周红副主席的安排，找到还没来得及回乡且入会意愿强烈的15名工友，带上身份证、登记照到街工会办公室登记资料，等待颁发会员证。周红副主席告诉我们，市、区、街工会要为我们举办一场隆重的人会仪式，并颁发会员证。1月23日上午，也就是农历小年那一天，是我们铭记心头的日子，扁担入会

仪式在汉正街小商品中心市场五楼举行，市总工会副主席陈义国、街工委书记刘洁、安善社区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张红彬在会上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欢迎我们扁担入会。陈副主席向我们颁发会员证，市场管委会还向每位扁担会员赠送一套毛衣。市总工会新闻中心也为我们拍下了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我们16名扁担会员手持会员证的合影，另一张是我们16名扁担会员与市、区、街领导的合影。这16名工友除了红安籍的我和马小进，还有京山籍的康仕山、随州籍的刘昌云和戴华修、广水籍的陈天星、安陆籍的张道文、麻城籍的周生文、大悟籍的孙世耀等，会籍先行安排在临近市场的安善社区工会联合会。从此，汉正街扁担找到了自己的家，市、区、街工会对扁担的工作陆续全面展开。当日中午，市总工会邀请我作为扁担会员代表和其他各行各业的农民工代表到三五酒店，与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苗圩一起吃年夜饭。与市委书记苗圩同桌的除我外，还有3名送气工、2名环卫工、2名纺织工，都是有劳模、十大杰出青年或“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的先模人

物，我深感这是市总工会对新成员的认可和引领，催我奋进有为。

没有单位、没有月工资的扁担加入工会组织，是工会组织建设历史上一次突破，开全国先河。曾有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孙春兰，省委常委、



2017年6月2日，硚口区总工会为汉正街流动搬运工工会赠送红色书籍

省总工会主席李明波，副省长蒋大国等领导来到汉正街视察这一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我分别受到过这些领导的接见。我们第一批扁担加入工会组织后，对其他扁担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加入工会的人数不断攀升。市场务工环境也得到净化，不法物流被取缔，再也没有垄断市场、对扁担滥收费甚至人身伤害的现象。工会组织对汉正街物业和物流公司的不法分子起到了震慑和管制作用。

家的温暖

2006年春节后，市、区总工会领导来到汉正街市场对扁担权益状况做了一次专题调研。2月23日，街工会在街工委、办事处的支持下，为包括扁担在内的农民工举办了一场趣味运动会，地点在旌德社区楼台，设置了有农民工特点的趣味比赛项目4项，如拔河、用扁担挑篮球、夹气球、托乒乓球等。来自市场的60多名农民工和20多名老板进行了比赛，可能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也可能是对文化活动渴望太久，大家都很激动，直径4厘米的拔河绳居然被拔断了。赛后获得奖品的刘昌云笑呵呵地说：“今天我们好开心。”《工人日报》、《长江日报》、武汉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对这次运动会进行了报道。

街工会还先后组织我们包场观看地方花鼓戏《状元与乞丐》、到社会主义新农村东西湖区石榴红村参观、游江城、到应城汤池温泉泡温泉……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2012年11月3日晚9时许，因第二天是周末，区总工会领导赵多驱车专程来到汉正街第一大道7号天桥路口，将30张杂技表演门票交到我手中，嘱咐分发给扁担工友去欣

赏。第二天晚上，我们30名扁担工友人生头一回观看了赏心悦目的杂技盛宴。

2007年年初，区总工会领导赵多和街工会常务副主席周红一起，来到扁担工友中调研生活状况，为了不耽误工友们干活，就在收工后一起开了座谈会，牺牲她们下班休息时间，获取详细的第一手资料。随后的3月20日，区委常委、区总工会主席蔡海雄和工作人员来到汉正街，会同街办事处主任靳远涛，主持召开了包括扁担在内的农民工与街办事处各职能部门面对面的座谈会。通过这次面对面的谈话，切实解决了农民工子女上学、就医、住房等生活实际困难。第二天《楚天金报》第7版作了整版的特别报道：仙桃籍扁担工友柳阳芳在会上说：“现在汉正街高楼林立，马路变得宽敞，不像以前堵塞拥挤，我们干活舒心。绝大多数人用手拖车送货，市场内放不下，放在市场门口多次被城管人员收走，能不能人性化对待，不收走我们的拖车。”街道城管办主任吕新忠当面回答：“会后划定车位，引导有序停放，不再暂扣有序停放的手拖车。”扁担们真正体会到区、街工会是办实事、解难事的好“娘家”。

2014年4月1日下午，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姜文舫、副主席赵多及街工委书记徐盛敏、办事处主任胡亚非一起来到汉正街农民工之家，再次召集我们扁担会员代表召开座谈会。到现在我还感到愧疚的是，预定开会时间到了，但参会的工友代表由于干活地点很分散，迟了半个小时才集中到来。通过这次座谈会，强化了基层工会组织建设，随后扁担工会规范起来，流动搬运工工会建会，会籍不再像以往那样挂靠相近社区工会联合会。赵多副主席还来到我们这个基层工会蹲点，建起“汉正街流动搬运工工友群”。

每年区总工会免费体检、“两节”送温暖、夏日送清凉都纳入了我们这个基层工会。

着重素质提升

工会组织不仅在生活上、物质上关怀我们，对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素质提升方面也高度重视。街工会组织我们扁担会员参观了汉正街博物馆，听取了“同城同心，共创文明”的讲座，发动扁担工友在创全国卫生城市、从我做起、不随地吐痰、文明过马路承诺书上签名。前往鄂中抗日根据地旧址，重温党的辉煌历史，缅怀革命先烈。7名扁担工友在陶铸塑像前向街党工委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扁担入会后，市总工会新闻中心周建敏经常来工友中了解我们生活情况，采写报道。在我们加入工会临近周年之际，他问我们对市总工会有何期盼，我回答希望得到工会书刊以充实业余生活，并随手写了一首打油诗递给他：“夫妻二人苦干，抚养学前儿郎。租住房屋虽小，不缺衣食饱暖。年关盘点得失，唯欠工运期刊。”2007年1月4日，源于我这首打油诗，市、区、街工会联合在汉正街农民工之家筹建的全市首家农民工书屋落成，据说也是全国第一家农民工书屋，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杨少成和区委书记李传德一起为书屋揭牌。在揭牌仪式上，市总工会向书屋赠送了《工人日报》《工友》《武汉工运》等读物，捐赠购书专款2000元。区、街工会还分别向特困农民工代表发放了医疗互助卡和棉被各100份。农民工书屋落成后，《工友》杂志社每月都为扁担工友寄来免费刊物。2008年6月28日，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倪建民来到汉正街，为农民工书屋授牌“职工书屋示范点”，成为武汉市

首家国家级职工书屋示范点。倪建民副主席亲切接见了我们几名工友，我向他汇报了在农民工书屋读书的情况，自己开始写文章并向《长江日报》《武汉工运》《工友》投稿，倪副主席表示很欣慰，鼓励我再接再厉。

硚口区总工会“到职工中去”工作队为扁担工会赠送了《人民的名义》《红星照耀中国》等一批红色书籍，鼓励会员多读书，读好书，增强自信，提升素质，学习就业创业技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形势。还邀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博士来工友中进行实用法律知识授课，联合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为我们进行“遵法守法，携手筑梦”专题讲座。

有了工会这个温暖的家，我和工友们逐渐融入这个城市。2006年4月15日，在街道领导的帮助和支持下，我倡议成立了汉正街农民工志愿服务队，并得到街工委书记刘洁的授旗。这是武汉市首支农民工志愿服务队，成立后深入汉正街市场、社区进行志愿服务。四川汶川地震、雅安地震后，市场组织捐款，工友们都力所能及地伸出援手，尽自己绵薄之力。武汉市筹建园博园期间，我从2012年起连续三年带工友一起到张公堤义务植树，2013年3月20日还和时任市委书记阮成发、市长唐良智一同植树，阮书记关切地问我们老家在哪里，现在工作、生活情况怎样，并代表武汉市对我们的志愿行动表示感谢。扁担工会委员胡修领和张道文利用自身文艺特长，在扁担工友中组织一支队伍舞龙灯、踩龙船，每年新春到各专业市场祝福商户开张大吉、新年好运，为市场商户和外地来打货的客户带来乡土文化，赢得多方好评。

扁担工会成立后，我连续两届当选为工会主席，尽管没有工资报酬，我也尽心尽

力当好这个主席，积极组织各项活动，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会员手中。由于工友们干活流动性大，每次组织活动都要靠手机联系，我从来没有报销过通信费。不管到哪里开会，也没报销过交通费、误工费，因为我很乐意做好这项工作。在工友金长江两名子女相继考上大学面临学费、生活费困难时，扁担工会及时将其资料报到上级工会，争取到工会组织金秋助学项目资助。随州籍工友戴华修和潜江籍工友江传谊，分别突发重疾急需到医院救治时，扁担工会马上发动其他工友和商户募捐，分别筹措资助款3.3万元和1.4万元。工友张道文和周生文家庭极度困难，扁担工会立即将其情况上报，帮助他俩纳入武汉市特困职工帮扶……

我为群体发心声

我在扁担工友这个群体中，有一定文化程度，便充分利用工会组织这个平台，为包括扁担在内的广大农民工发出心声。扁担工会成立后，2006年3月30日，省总工会领导一行在市总工会召开武汉市农民工代表座谈会，听取农民工的心声。区总工会安排我和工友刘昌云作为扁担会员代表参加。座谈会以不点名、自由发言的方式进行，开始大家好一会儿不开口，我率先打破沉默，第一个发言，提出流动从业人员既然纳入工会，就应当纳入政府评优评先体系予以激励，赢得了大家的掌声。如今这一建言已落地实行多年。



2019年7月24日，硚口区总工会为汉正街的工友们送清凉

2008年3月28日，武汉市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召集全市用人单位人力资源部代表和农民工代表召开农民工权益状况座谈会，为即将制定《劳动关系法》建言献策。区总工会安排我和省首届十佳优秀农民工、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环卫工陈静堂与会。整个上半场都是用人单位在发言，短暂休息后，富士康武汉人力资源部负责人继续发言完毕，市政协副主席李传德明确提出，鉴于上半场没有农民工代表发言的机会，余下半场由农民工代表发言。我获得发言机会，在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得知我是一名扁担工会代表后，李传德副主席回顾起他在硚口任职时，对扁担人会得到全国总工会肯定的事情仍记忆犹新，赞许之情溢于言表。虽然大多都是谈的劳动合同关系的话题，但我发言提出了自己更关心的问题：农民工在家乡办的新农合，但工作在武汉市，看病住院要回当地才能报销，能不能就地报销？李传德副主席听后表示将反馈到市人社局研究。

如今新农合也称居民医保，城乡居民医保一体化，缴费报销比例都一致，在农村缴费只要到武汉人社局办一个“关联”对接，就能在武汉享受武汉市居民医保待遇。

2012年5月13日，受湖北日报社邀请，我参加了报社举办的湖北省第十次党代会“喜迎党代会，我看新荆楚”武汉行参访团为期一天的参访活动，见证、感受了武汉的发展变化。当日上午8:50，在武汉市政府两层老建筑的小礼堂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贾耀斌率市发改委、人社局、商务局等市直部门负责人与参访团成员交流互动。我向贾副市长提出将武汉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公租房保障，以分享武汉改革发展成果的建言，他回答说，随着国家加大社会管理创新力度，相信包括农民工住房等问题将逐步解决，武汉将会在现有体制下寻求突破。如今武汉市农民工纳入公租房保障已实现多年。2017年，湖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期间，《湖北日报》“党代会直通车”栏目记者成熔兴再次采访我，我以在农村的亲身经历，提出重视农村改革发展、忽视在外农民工权益的问题引起关注。

我的感言

我在这个城市的岁月里，亲身经历了人生三个重大变化：一是我作为一名汉正街流动扁担，被工会组织接纳，成为基层工会一员。二是我作为一名扁担，既没有高学历，也没有物质财富，却能享受政策在武汉安家落户，随迁的儿子也在这里从小学读到高中，并考上了一所211高校，这都是得到了工会的温暖关怀。2007年，武汉市进行首届优秀农民工评选，鉴于我勤劳肯干，商户和工友普遍信赖，街工会向街道推荐我为优

秀农民工人选，街工会常务副主席唐琼还到我租住地社区、街道走访了解我的表现，获知我们夫妻俩在汉正街干活，租住在汉阳区城乡结合部，带个孩子上幼儿园确有不便，遂向街工委书记靳远涛提议，在汉正街搬迁后的厂房内开辟一间小屋，低租金租给我，解决了住房难题，也为日后儿子稳定就学、落户提供了条件。三是我作为一名普通的扁担，不仅被这个城市逐渐接纳，同时也逐渐融入到这个城市中来，先后当选为武汉市首届优秀农民工、流动搬运工工会主席、新时代汉正街103之星，连续三届当选硚口区工会代表大会代表，并成长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多次被街工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

作为一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我不仅加入了工会，还有机会代表群体发出呼声，同时得到有关部门及领导的倾听、回应与落实，充分体现了各级党、政、工领导亲民爱民拥民情怀：“民有所呼，我必有应。民有所求，我必有为。”也深切感受到武汉是一座包容的城市、一座温暖的城市。

我要感恩武汉这个大都市对广大一线外来农民工在思想和行动上的同步接纳，感恩各级党委、政府的亲民爱民之举，感恩习总书记“为民、忧民、亲民、敬民、惠民”的民生情怀，这些都将成为我日后继续奋发向上的动力。

（钟思利：汉正街流动搬运工工会主席）

难忘风雨同舟情——忆陶军

◇ 章开沅

时间过得真快，我与陶军同志相识并共事 38 年，而他的猝逝至今也有 30 余年。抚今思昔，感慨万千。

我们相遇于烽火连天的岁月，抗战已经结束，内战仍然蔓延，是革命把我们聚集在一起。1948 年 11 月我从南京北上，越过国民党封锁线投奔向往已久的解放区，并进入开封中原大学接受短期培训。陶军则是这年 5 月从华北南下，正好就在中原大学担任教员，不过并未到我们 20 队讲过课。所以直到 1949 年 4 月我培训结业，留校分到政治研究室当研究生并担任助教，这才有机会见到慕名已久的陶军。

我与他并非同一教研室，但我们中共党史组的指导教师方衡却与他是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他们是燕京大学同学并一起参加地下工作，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又

一起潜入晋察冀根据地，在著名红色报人邓拓领导下参与《晋察冀日报》编辑工作。据方衡说，邓拓对陶军很欣赏，因为他是中英文俱佳的才子，这一期间还曾兼任报社英语翻译。1948 年，方衡与陶军又一起随刘介愚南下，参与中原大学的创建与教学工作，两人形影相随，如同手足。正是通过方衡的介绍，我对陶军更加钦佩，而他似乎对我也比较关注。可能由于都是世家子弟，加以都曾就读于教会大学，情趣比较相近吧。

革命形势如同风卷残云，1949 年 4 月下旬，解放军迅速发起渡江战役，一举解放南京、上海、武汉等重要城市，随后就是全国解放并且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形势一片大好，但我们思想却有些混乱。一些像我这样参加革命未久的青年学生，满心指望奔赴前线杀敌，但解放大西南，乃至海南岛等



陶军教授和老伴杨景星在武汉大学校园内住宅楼附近合影

等战役，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参军申请都未获批准，命中注定难圆决胜于疆场的美梦。而陶军这些颇有抱负又风华正茂的教员，也有各自的盘算，希望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他本人就颇想离开学校转入外交战线。校部为此特地请中原局宣传部副部长赵毅敏为全校干部讲演，为我们解决思想问题，因为我们留校工作者已经面临着新的更为艰巨的战斗任务，那就是为建设新型人民大学而奋斗。赵部长的训话入情入理，大家听后颇受感动，反正大家都以革命战士自居，已经习惯于一切服从组织分配，所以很快就摒弃私心杂念，斗志昂扬地投身人民教育伟业。

1949年7月，中原大学全校迁至武汉。我们政治研究室随同校部住进一座废弃的

大型汽车修配厂，因陋就简，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准备，迅速恢复短期干部培训工作，以适应新中国建设各条战线的紧迫人才需要。我们已顾不上自己的学习，下放到各队参加教学工作。我被分配到57队，因为队主任就是原来20队的主任牟政，是他点名把我要去的。这段时间，大家都忙得昏天黑地，与陶军很少见面。但是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根据中央指示，要求中原大学立即向正规人民大学转型。学校把原来的几个分部，改组为政法、财经、教育、文艺4个学院。57队学员卒業以后，我被分配到教育学院。教育学院初步设立政治、教育、历史、俄语4个系。陶军任政治系主任，

兼管俄语系工作，常春元任教育系主任，方衡任历史系主任。学院规模不大，仅占厂房面向千家街侧门几座楼，正对门的一座主楼只有两层，楼下是院部各个部门办公室，楼上是王自申院长、郭抵副院长与陶军、方衡等系主任的宿舍。各系专职干部极少，只有一位助理员（专职，相当于行政秘书）与一位助教（相当于教学秘书）。助教均由随校南下的政研室人员兼任，我担任历史系助教，杨宏禹、朱轶、严华分别担任政治、教育、俄语三系助教。助理员也都是中大南下干部，记得历史系最初是古堡，政治系是张洪，他与我曾同在20队一个学习小组。正是因为规模小、人员少，所以大家几乎天天都能见面，或商量工作，或业余闲聊。王自申院长是追随老师徐特立参加革命的，

早在1929年已经入党，虽然年不过半百，但大家都尊称为王老。他也确实像是一位老前辈，待我们如同家人子弟，经常絮絮叨叨谈延安往事，殷切期望我们继承优良革命传统。

教育学院虽然较小，但在武汉乃至全省却颇有影响。这不仅是由于王老德高望重、诲人不倦，陶军等资深教员的政治理论报告也脍炙人口、风靡三镇。特别是陶军的风度、学养与口才，赢得各界（特别是学界）人士的赞赏，几乎是有口皆碑。尽管总是一身简朴军服，但其神态气质自然流露风采。各个单位争相邀请，他难以应付，有时命我代劳。可能是相知已深，每次演讲事先只交我一纸英文提纲，寥寥数行，让我尽情发挥。我自幼内向怕羞，从来不敢在大庭广众讲话。南下武汉后，虽然为中大数百学员讲过辅导大课，也没有多大长进。但陶军却能看出我的某些潜在优势，放手让我到校外大场面经受磨炼，逐步增强了我作大型报告的自信。我不知道是否由于陶军与牟政的推荐，王老等院领导还安排我当研究生会负责人，并且作为青年代表参与院政治学习委员会，具体负责组织教职工每天早点前一小时的政治学习，包括自学、讨论、测验、考评等。据说当时院内外有所谓“三元”之说，即高元、常春元、章开沅，说我们政治理论学习刻苦，能起带头作用。我当然有自知之明，从来不敢与前辈相提并论，但这些反映客观上对自己起了鞭策的作用。

1951年，中原大学与华中大学合并，陶军奉命作为军代表负责前期筹备工作，并多次前往县华林为华大师生作政治思想工作报告，并且与知名学者、进步学生广泛交友，深入调研，堪称是促进华大改为公立的先锋。

华中师范学院建院以后，陶军担任副教务长，与教务长、著名物理学家卞彭等原华大领导人密切合作，顺利完成了院系调整，华大从教会大学转变为公立大学，而中原大学也实现了从政治培训向正规大学的转型。1953年王老不幸病逝，刘介愚接任华中师院党委书记，他本来就是陶军的老上级且两人共事已久。中央又把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原广西大学校长杨东莼调来华师担任院长，这样更加强了华师的领导，开启了华师早期发展的新局面。

20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圈子里有所谓“外行领导内行”之说。大约是由于形势发展急速，为了加强高校党的领导，调派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进入大学。这些老同志长期从事以战争为中心的革命工作，即令读过大学也不熟悉如何在新的时期建设史无前例的新型人民大学，何况其中还有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干部。中央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所以反复叮嘱这些新上任的大学领导：

“尽快从外行变成内行。”相较而言，华师的领导班子多数曾经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在解放区也曾多年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因此他们的转型很快，而且容易与原有教职员工相互沟通。

杨东莼就任之始，就高调呼唤“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真才实学”。校党委在1955年以后及时把工作重心转向教学、科研与学科队伍建设，而教务处则成为这一转变的轴心。因为那时没有科研处，只是在教务处设立科研科。1956至1957年认真贯彻中央“双百”方针，并动员全校教师“向科学进军”。陶军作为副教务长，协助书记、校长统筹调度，工作极为出色。他对青年教师的培养特别关注，鼓励我们参加校内外各种学术活动，并且在1957年创刊的《华中师范学院

学报》连续刊登我的长篇论文《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与《关于太平天国土地政策的若干问题》，对我真是极大的鼓励与鞭策。1956年的春天曾被誉为“科学的春天”，在“双百”方针带来的宽松环境中，新中国第一代教育家比较志气发舒而又得心应手，从规模与水平两方面为新型正规人民大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1957年整风，党中央提出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意见。陶军作为党内高级干部，也带头参与鸣放，提出许多中肯意见。但却被某些“左派”人物视为“反党之言”，几乎被带上“右派”帽子。三年经济困难后期，党内有识之士力挽狂澜，调整路线，使国民经济逐步得以恢复。陶军作为教务长及

时提出“恢复旧家园”口号，引导全校师生走上教学与科研的正途。为加强学科建设，校党委拟定了各个学科带头人培养名单，根据陶军的具体策划，物理、历史两系分别总结刘连寿与我的成长道路，上报省委加以推广。其实我们仍被许多人当作重业务轻政治的异类，“教育革命”期间还曾当作“小白旗”被拔；而现在居然被树立为“又红又专”典型，华师党委（包括陶军）需要多大气魄才能如此旗帜鲜明。忆及这张名单，对照华师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深感当年华师老领导的知人之明与高瞻远瞩。

我与陶军仍无私下交往，但他经常关注并支持我的工作。1959年我下放回校后，他曾批准我请假一个月，为上海海燕制片厂郑君里导演试写《太平天国》文学剧本。1960年暑假以后，他又批准我全力投入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筹备工作。1963年，他与校党委更主动给我两年学术休假，还与北大侯仁之教授联系，让他向邵循正教授推荐我到北大进修。这一年多的北京访学，对我的学术生涯起了关键性提升作用。

在此期间，华师还在若干重点学科试招研究生，陶军对学位制度寄予厚望，曾经感慨说：“如果多年以后，华师校园能有十几个博士生晃荡晃荡（安徽话，到处走动之意），那该多好！”但是，为时不久，政治风浪又干扰了大学正常工作。抓阶级斗争与“社教运动”普及全国，师生几乎无法正常上课，而所谓学术讨论已经转化为政治声讨。我也因为李秀成评价问题被中宣部定为全国重点批判对象。我不知道陶军对此作何感想，但



学生时代，陶军在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留影

省委宣传部与学校党委对我是理解与同情的，所以并未受到严重的处分与冲击。而老院长杨东莼则借用“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筹委会”名义，再次把我借调到全国政协，参与学术方面的前期工作。

1966年5月，“文革”正式发动以后，所有这些“救援”都化为泡影。陶军首先被定为华师“三家村”黑帮代表人物，在官方媒体上以整版篇幅声讨，我也很快奉命回校作为“黑线”人物接受批判。造反派曾经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高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幅，强迫我们以“喷气式”姿势戴高帽、挂黑牌接受批斗。及至军宣队进校，我与陶军又被发配到梁子湖东风农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我们在农场的处境有所好转，因为当地农工根本不关心华师内部的斗批改，将我们一律视为城里来的大学老师，虽有距离但不失相互尊重。特别是带队的军宣队萧副指挥长，原本是北京的大学生，参军南下后多少保持书生本色，对我们这些曾有相同经历的知识分子，似乎怀有较多的理解与同情。因此，我们在农场全心全意投入双抢劳动，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性的学习与批斗大会。我与陶军、杨宏禹等按军事编制分在一连一排，连长是原校党委秘书周振辉与党史教员陶凯。周振辉一贯态度温和，平易近人，而陶凯过去与我们更是朝夕相处，关系亲密。我们一个排集中住在农场仓库一间大房中，统统睡双人床，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平等相待，几乎忘记了桂子山依然延续着的“文革”。我们白天紧张劳动，晚上无事却尽可三三两两闲聊，因此这段时间是我们与陶军交流最为密切的岁月。尽管省委与校内“左派”势力对陶军穷追不舍，甚至还以省委正式文件把陶军定为“漏网右派”，但全国仅此一例。我们这些南下老战友都漠

然视之，在我们心目中陶军依然是我们的革命前辈、老领导、好老师。有次周末，陶军夫妇热情邀请老友们餐叙，把盏品鱼，谈笑风生。突然农场的大喇叭响了，有人高声呵斥：“现在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忘记自己的身份，吃吃喝喝，拉拉扯扯，你们别认为已经没事了！”这声音很熟悉，显然是华师的某位“左派”。我们感到愕然，但随即哈哈大笑，照样“吃吃喝喝”，因为这种警告我们早已习以为常，而且相信周振辉、陶凯绝对不会为此责怪。

我于1973年提前回到桂子山，因为历史系已经招收工农兵学员，恢复教学工作。不久，陶军也回到华师，虽然戴着“右派”帽子，但至少政治、历史两系老师对他仍然保持内心尊重。正好历史系涂厚善、刘继兴等世界史教师承担着商务印书馆《印度社会》等南亚史相关代表作的翻译任务，陶军的英语水平甚高，也被安排进入这个团队。他们在“文革”后的译著工作非常出色，为以后成立印度史研究中心奠定了基础。

1976年秋，“文革”结束，老书记刘介愚从武大调回华师，陶军也得到彻底平反并担任副院长。院长刘若曾原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也是终生热爱教育事业的前辈，所以新老领导相处比较融洽。陶军再次“恢复旧家园”，提出学校应尽快结束混乱局面，重新建立正常秩序。同时，华师与中山大学还率先恢复学报，并且公开向国外发行，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1979年秋我初次访美，所到之处都有人问，连北大、清华学报都未能公开向国外发行，你们学校为什么能够如此开放？陶军是主管外事的，我校又接受了第一批美国高层学者来华进修（如高慕柯等），还接受了耶鲁大学青年英语教师轮番来外语系工作。外事处的年轻干部热情干

练，他们与耶鲁大学的年轻人很快打成一片，并且利用暑假办了好几期美国人学习中文的培训班，扩大了华师在海外的影响。

但是，华师校领导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左”倾思潮和“文革”期间派系斗争的遗毒，使得有些人总是把学校老领导官复原职看成是“走资派”复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些人自以为是对革命忠诚，实际上已成为改革开放的严重阻力。陶军虽然早就平反，但仍然被认为有“崇洋媚外”嫌疑。例如，耶鲁大学的“雅礼协会”（Yale in China）一直在寻找往昔合作办学伙伴——老华中大学。经过反复调查核实，终于认定华师是华大的继承者。由于读过教会大学，陶军比较珍惜这段历史情谊，很快就与雅礼协会正式签订了新的学术交流协议，并且及时上报教育部。可笑的是校内居然有人无理取闹，认为这是帝国主义文化渗透，并且迫使校党委取消这一协议。他们还想进一步兴风作浪，幸好教育部及时批示同意华师与雅礼协会的交流协议，才使得这些人偃旗息鼓。但华师取消协议的通知已经发出，雅礼协会无从接受这一尴尬局面，只有暂停相互交流。直到我接任院长再次访问耶鲁大学，才重新延续了这段历史情缘。

1981至1983年，陶军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代表，总算圆了他30多年以前企望转战外交战线的美梦，并且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他的风貌与才华。但是由于年龄限制与健康原因，他终于回到华师这个永远的老窝。其时正好碰上学校领导班子换届，根据中央“年轻化、专业化”的原则，原有的老领导基本上都退下来了，陶军虽挂名“顾问”，但已不再介入校部工作。他从不计较这些名利得失，仍然一如既往地敬业乐群，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呕心沥血地参与华

师出版社创建工作，这是他最后遗留给母校的又一项重大劳绩。他虽然年近古稀，但仍然朝气蓬勃，充满乐观与信心。华师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在学术水平与对外交往方面突飞猛进，他那“有十几个博士在校园里晃荡晃荡”的梦想早已成为现实，华师前程似锦，这对一个老校长真是莫大的安慰。然而天不假年，1987年他因心脏病猝发而辞世，发病正好在校门附近，我赶到时他已被抬上救护车。由于他昏迷未醒，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救护车急速驰去。从此天人相隔，却又未能最后告别。唯一使我得到安慰的，是他那安详的面容，似乎没有任何痛苦，更不显任何悲伤。

再喊一声陶军同志！风雨同舟38年，怎能忘记那些共同战斗的岁月，患难与共，艰危共担。我虽不是千里马，却始终难忘你知遇之恩，正是你的关切、期许与多年的引导，才使我多少能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你的名字已经为好几代华师人所铭记，并且必将融入渊远流长的华师学脉之中。

（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

我与民大的片断回忆

◇ 章绍嗣

1961年爆热的夏天，我从武汉市27中学考入中南民族学院，从洪山脚下到南湖之畔，在这片土地上，断断续续学习、工作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原想完整地写一长篇回忆，但囿于精力和时间，就随记忆所及掇成若干片断。

终生难忘的除夕之夜

记得离家的第一个春节就是在中南民院民族团结的大家庭里度过的。除夕之夜，我们班留校同学在宿舍写对联、包饺子庆祝农历新年。正当我们兴高采烈地忙碌时，推门进来一位40来岁戴眼镜的中年人，慈爱地微笑着，拱手给大家拜年。一看，竟是白瑞西院长，同学们一下子怔住了。他说是来看一看，和各族新生共迎新春，大家便热烈地鼓起掌来。接着，他和同学们拉家常，谈学习，嘘寒问暖，全无领导的架式和长者的威严，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同学们围坐在他的身边，听他介绍山西面食的种种做法，什么刀削面，什么拨鱼儿啦……说着说着，他又挽起袖子包起饺子来，一切随意自然，亲密无间。吃完团年饭，我们簇拥着他，走出宿舍到室外放爆竹，他指着门上刚贴的一幅对联吟诵着：“苗瑶侗壮回汉黎情同手足，湘黔鄂琼粤桂豫亲如一家”，称赞编撰得不错，主题好，立意新，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和谐协调，字也写得龙飞凤舞，又指出了在平仄和对仗上的不足，同学们频频颌首，表示赞同。我们唱着歌，看着天空中五彩缤纷的礼花，心里暖融融的，仿佛回到了家乡，置身在亲人之间，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除夕之夜。

提起白院长，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民院专、本科的创建，数学系和历史系的增设以及恢复民院的艰辛，想起他的工作、他的教诲和他的著作，想起他在民院这块土地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几十年。受过他教育的人，和他共事过的人，一想起他来，

就有一股尊重和热爱的暖流涌上心头。

我陆陆续续在民大学习、生活和工作了数十年，在思想、教学和生活上受到白院长的教诲、告诫和帮助，获益匪浅。在民大工作过的人都深知他作出的成绩与贡献，在民族教育战线上，白院长勤勉工作、俭朴生活、廉洁奉公、严己宽人的品格，是人所共知、交口称赞的，无需我来赘述。这里还要说的是，白院长从学校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依然关心学校的改革与发展，仍在思考和探索民族教育的前景与路向，总结和分析民院办学的成绩与失误。在晚年身患恶疾时，他仍强撑病体，撰写了10余万字的《决策与管理：在民族院校的实践和体会》一书，将自己大半辈子从事民族教育的经验、教训与体会留给下一代人。他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和社会实践方面提出的极具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意见，是卓具眼光的，也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后的教诲和精神财富。

木铎金声，沧桑巨变，从洪山脚下到南湖之滨，从194个学员到2万多名学子，半个多世纪的风尘岁月，今天的中南民族大学走过了60多年辉煌而艰难的历程。这片热土，沐浴着党和国家关爱与希望的阳光，也凝聚着几代民大人勤劳和智慧的汗水。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民院的创立与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的学校老领导、老教师 and 老职工。老院长白瑞西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我们仍在怀念着他。

终圆再回民大之梦

1997年6月18日，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那天，当我从省长蒋祝平手中接过印着烫金大字的聘书，望着“兹聘请章绍

嗣教授为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 省长蒋祝平”那两行端庄的楷书时，我的眼睛模糊了，数十年来的忧喜苦乐一下子涌上心头……

1967年，毕业不久，我被安排到市郊的一个县城，那正是“臭老九”最倒霉的历史年头。尽管我历史清白、成绩优秀，可是拿着国家发放的通知单，跑到文化馆、广播站、图书馆，乞讨似的希望找到一个收留我的地方，但个个单位都无法安排。我被暂时“寄存”到一所小学里，工作则根据“中心任务”灵活安排。在那以后的几年中，我什么没干过呢？缺人上课，到学校当教师；排样板戏，去剧院拉京胡；修建公路，为测量队扛标杆；到铸造厂搞浇注，拖板车跑运输……有一次，我穿着破旧的工作服，满面油污，拉着板车到各厂矿回收废油，走到路口，碰到一位多年未见的朋友，我扔下车迎上去，高兴地伸出手，哪知那位朋友上下把我打量了一番，转过头就匆匆跑开了。后来才听说，那朋友以为我犯了错误，是个什么“分子”，正在劳改哩。多少个夜晚，每当独对孤灯，一腔忧伤，无限懊恼，一齐涌上心头，我后悔不该上大学，后悔不该上文科大学，后悔不该上“文革”时毕业的文科大学，心里幼稚地想：要是学理工科就不会命运多舛了吧。这时我被正式安排到一个街道纸箱厂，工作才有了归宿。我多么渴望能为祖国多尽些力量，于是决心重新“装备”自己。我相信：成吨的汗水将漂起事业之舟。我在墙上写了“卧薪尝胆，自强不息”八个大字，从日历上撕去了所有的星期日和节假日，在作息表中划去了娱乐和午休，开始自修工科大学机械系的课程。白天和工人们滚在一起，晚上到“七二一”夜大听课，休息日便一头钻进阁楼，看讲义，做练习，直至深夜。两年后，我学完《机械制图》《机械

原理》等课程，拿到了“七二一”夜大的结业文凭。我高兴地写信告诉一位老师：“如今我放下诗人的竖琴，拿起了技术员的笔杆。”尽管我是全厂唯一的“大学本科生”，可是命运对我并不青睐，我的努力遭到了那个时代的嘲弄。我自信“文武双全”，却找不到“用武之地”，仍然只能继续当“外协员”，整天踏着三轮车四处奔波，到大厂送取加工的“协作件”。希望再一次破灭了，在痛苦和困惑中，我难以自拔。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文件一个个下达，我从祖国在艰难中振奋的号角中，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在企业整顿中，工厂发展成自行车零件厂，由纸箱转产钢圈。人的价值、知识的价值好像一下子被发现了，我被安排到厂里生产部门担任管理员，要在两个月内试制出第一批合格产品。我卷起铺盖，和试制组的同志们住到办公室，争分夺秒，日夜奋战，只用一个多月时间，就生产出了锃光发亮的轻便型钢圈，很快投入了批量生产。望着自己设计的钢圈形成流水线，我的心多么激动啊！不久，我被委任为厂技术室负责人，管理全厂的技术工作。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虽然在生产上我已能凑合，但总感到费劲，感到力不从心。在心灵深处，我在呼唤着自幼喜爱的专业。1980年5月，上级关于调整学非所用人员的通知下达，我怦然心动，偷偷跑到招聘工作人员的武汉师范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试，出人意料地被录取了。著名语言学家朱祖延教授约我谈话，签名赠送我一本他刚出版的著作，鼓励我从事语言文字工作，学校党委书记坐着小车来到厂里主动商谈我的调动。真是凑巧，正在这时，“文革”中被迫撤销的中南民族学院经国务院批准恢复

重建，我的名字列在调回母校的名单之中，我向厂、局组织部门讲述了十多年来工作错位的曲折遭遇，倾诉了自己学非所用的苦恼。我相信党组织会理解一个知识分子困顿而渴望的心。

1980年10月，我调回复办重建中的民院，回到了寻求、等待、期望了十多年的专业之中，我的心像涨满春水的小船，在浩瀚的学海扬起新的风帆。我深切地体会到：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学校的命运紧密相连，如鱼于水，须臾难分。

向前冲，又一个新的起点

1980年，当我重新回到母校，站到讲台上成为一名现代文学教师时，已经岁逾不惑，人到中年了。站在别人已经跑了一大截后的起点上，自己已是一个落伍者，无论教学和科研，每一步都是艰难而沉重的。

现代文学研究，被行家称为“拥挤的学科”，所有的领域几乎都被刨得坑坑洼洼，研究对象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研究者的密集型劳动。但我是幸运的，改革开放大潮的涌起带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许多过去被左倾思潮禁锢的领域冲破了。从1980年起，我一头扎进了当时还鲜有人涉足的抗战文艺里作专题研究。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3500万军民，以骨岳血渊铸就的中华民族之魂是令人刻骨铭心的，以强烈民族解放意识和炽热爱国主义为思想特质的抗战文艺使我震撼不已，我决心在这个研究领域中耗尽毕生精力。在那段筚路蓝缕的日子里，我奔波于天南海北的数十个单位和图书馆，寻觅那些历经战乱得以幸存下来的图书资料，访问当年抗战文艺运动的许多目击身经者。几年下来，搜集整理了一批被湮没于历

史尘埃中的文学资料，受到武汉市文联文艺理论室和学院科研处的重视，并得到他们的帮助。

抗日战争的历史，蕴藏着极其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内容，在团结御侮的爱国大旗之下，举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党派、社团活动中所激发出来的炽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渴望自由民主独立的强烈愿望，其经验和教训，对现实和未来都有着宝贵的启示。它不单是历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从事研究的巨大宝库，也是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

为使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业绩不致湮没，让中华民族抗暴御侮的可歌可泣的精神彪炳千秋，我决心在这个领域中从事研究和写作。按照规划，我打算在退休前完成一套史料集、一本史著、一本论集、一部大型辞书、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本的写作。

在汗水的挥洒中，我的计划一步步得到实现。1985年，数十万字资料在市文联编辑的《武汉文艺史料》中发表，一些成果被省、市地方志收录采用。在研究中，我结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他们一起撰写成《武汉抗战文艺史稿》，1987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以断代史专著的形式

“再现了半个世纪前在临时抗战首都武汉盛极一时的文艺奇观，填补了中国抗战文艺史研究中几乎被淡忘了的一个空白。”1990年起，我又和田子渝、陈金安先生一起，历时5年，精诚合作，主编了270万字的《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该书成为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公布的“纪念‘二战’50周年的18种重点书之一”向全国推荐。中央电视台和20多家海内外媒体均予以报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获得了多个奖项。在学校里，我开设了《抗战文艺研究》的选修课，

结合研究，写作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并多次在省、市报纸开辟“抗战文坛”“武汉文化”《抗战楚文坛》等专栏，发表有关抗战文艺的札记、随笔近百篇。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我出版了十部著作（可叹影视剧创作未最后完成），从助教逐步晋升为教授，一直愉快地工作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

回顾这些年来走过的路，在别人唱着“潇洒走一回”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活得真是又苦又累，寒暑假完全交给了奔波的旅途，教课之余的时间几乎都耗费在笔砚之间，如今已头发稀疏，腰弯背驼。但我并不后悔。就是在商海澎湃，周围一片扑通扑通下海之声，教师囊中羞涩、文人自惭形秽时，我也并未动心，自忖未谙其道，只是一个笨拙的教书匠而已，我还要沿着这条路不懈地前行。能不能达到预定的高度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能放弃自己对于理想的追求。在自己退休之后，虽然自叹的是已经步入老年而还很不成熟，离既定的目标还很遥远却已感到体力不支，但我愿意在晚年作继续努力，争取为自己一生的理想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首个教师节的四代同堂

1985年9月的江城，新秋初凉，丹桂飘香。学校中文系邀请著名的苏俄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大师戈宝权先生来学校讲学，我负责接待工作。一天，我和几个学生到戈老的房间聊天，当他得知著名社会学家吴泽霖教授现在我校民族研究所工作时，喜出望外，显得非常高兴。他兴致勃勃地说：“今年是我国的第一个教师节，吴老是我50多年前的老师，我一定要去看看他呵，就烦请你们带个路吧。”我和学生们自然也很高兴，

便一起来到了“小八栋”，当吴老打开门时，望着毕恭毕敬站在面前的陌生来客，十分诧异。戈老连忙说：“吴老师，不认识了，我是您50年前大夏大学的学生戈宝权呀！”吴老仔细端详着，然后似有所忆，记起了这个在抗战时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中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文化人，忙把大家迎进屋内。

20世纪30年代初期，风华正茂的戈宝权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吴泽霖留美归国不久，正在该校任教，教过他的社会学、民族学等课程。吴老渊博的学识曾使戈宝权惊叹不已，时有过从。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吴老辗转上海、北京等地，支援新校才来到民院；戈老历任驻苏大使馆的文化参赞，飞机来去，常在国外，师生一直无缘见面。时光荏苒，这次却能在南湖湖畔邂逅相遇，两人都喜出望外，兴高采烈，师生的记忆之火突然爆发，历历往事呈现眼前，各述经历，数说故旧，越说越起劲。一阵欢声笑语后，只见年逾七十的戈老将椅子拿到房屋正中，又把吴老扶去坐上，然后行三鞠躬。87岁的吴老看到72岁的戈老执弟子之礼甚恭，兴奋异常，连连盛赞学生事业和学术上的成就，笑呵呵地说：“真是一代胜过一代呀！”戈老也笑容满面地说：“多么巧呵，简直叫人怀疑是文学中的虚构了。”两人紧握着的双手许久没有松开，我和我的学生也被这场面感动了。两老看着师生四代同堂，鼓励在场的各族青年学子都要超过自己的老师，为国家作出贡献。欢笑声声，掌声阵阵，校园中洋溢着师生同乐和民族团结的热烈气氛。

作为一个民大学子和教师，我曾有幸参加并参与了学校10、35、40、50和60周年的校庆工作。在我退休数年之后，没有想到2011年学校一纸行文又将我安排到校庆

办工作。虽出乎意料，却使我又一次感到领导和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与期望，正是这份沉甸甸的嘱托和责任，让退休多年的我又开始了“坐班族”的生活。在校庆办这个和睦协调的小集体中，我和同志们一起参与策划校庆活动方案、筹组各地校友会、编写简报与通讯、征集文物编修校史等，再一次感受到工作的充实与愉快。

从洪山脚下到南湖之滨，从一个学生到一名教师，我有幸经历和见证了母校从初建、复办到今天的历史，深为学校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异乎寻常的繁荣而高兴。因此，我在受命草拟《校庆公告》时，情不自禁地写道：“学校已形成了门类齐全、结构合理、协调发展的完备学科体系，成为培养我国少数民族干部和民族地区高级专门人才的摇篮之一。我校的历史是一部光荣的创业史，艰苦的奋斗史，民族的发展史。它一个甲子的经历，是新中国民族高等教育的一个缩影。中南民族大学的实践和成功是我国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在执笔书写《致校友函》时，我再次写道：“在改革开放后，特别近几年来，更是学校创建以来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之一。学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朝气蓬勃，充满生机；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声名远播、饮誉四方。”这是我发自内心对学校繁荣昌盛的歌唱。

（章绍刚：中南民族大学党委统战部原部长，教授。本文系遗作）

建言博物馆建设的链式反应

◇ 邓超华

我的博物馆情结是从一次民办博物馆（以下简称民博）调研考察开始的，经历了调研的“情窦初开”，撰写社情民意的倾情民博，到递交一份民博提案的情真意切，触发我作为政协委员建言我市博物馆建设的一系列链式反应。下面就讲几个小故事。

一次发言，情注民博

2012年10月，我接到武汉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的通知，参加“文化五城”之“博物馆之城”建设的调研活动，这是我从市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转到文史学习委员会以来的第一次活动。对此次考察调研，我是既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作为教师出身的我，面对武汉文史界的“大咖”“巨头”们，如何针对陌生的博物馆建设座谈发言，是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的；熟悉的是，我有三届市政协委员、曾任教育界别召集人的底气，对考察调研发言形式是知晓的。做好会前准

备，是我多年来参加政协活动养成的习惯，我从博物馆的定义和功能，成为博物馆的基本条件，国内外知名博物馆的特征，武汉市博物馆的状况、存在的差距和困难以及自己的几点思考这五个方面进行了准备，感到博物馆是很有文化意趣的地方，民博更是很好的补充，其发展空间很大，值得通过政协参政议政的平台助推民博健康发展。

10月11日，文史学习委员会的委员们集体乘车去市郊蔡甸，车上我静听他们海阔天空的交谈，车内充满着浓厚的文化气息，时而谈文博，时而谈字画古董，令我耳目一新。一小时车行到考察地——武汉天人合一奇石博物馆，刘明利馆长及蔡甸区政协相关人员热情迎接。进到展厅，各种奇形怪状的收藏石品大放异彩，令人目不暇接，敞开的大库房堆满各地原石。走到会客厅，委员们促膝交谈，刨根问底，有的委员即兴挥毫。我只有好奇地翻看着《藏石图册》……

座谈会上，时任市文化局局长陈邈馨

通报了武汉市“文化五城”建设、打造“博物馆之城”的情况，刘明利馆长介绍了创办天人合一奇石博物馆的因由、馆藏、奇石特征、运行状况、政府支持、存在困难等。委员们积极建言，我的发言讲了五个层次：一是武汉市是历史文化名城，“博物馆之城”建设是“文化五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轻视。二是民办博物馆在我市的

兴起意义重大，它是文化的补充，同样发挥着博物馆存遗、高雅和民娱的作用；相对于国博的公办，民博是自发的、原发的，需要积极引导，应纳入我市文博规划，在全市布局、用地等方面应该有所支持。三是民博和行博具有小型化、专业化的特点，如青岛市街角的邮电博物馆已有上百年历史，至今仍在营业；我于2009年就写过关于工业博物馆和桥梁博物馆的提案，我市民博、行博建设的空间大，如纱厂的纱博、税收的税博、邮局的邮博等。四是武汉作为桥梁之都，建议加快建设桥梁博物馆，不仅要体现天兴洲长江大桥建设的六项世界第一，还要对二七长江大桥、青山长江大桥等正在建设中的岩层、模型等博物馆要件抓紧收集。五是要重视我市博物馆人才的培养和从业人员的岗位职业培训。

我的发言引起了委员们的共鸣，会后文史学习委员会主任郑重委托我执笔撰写调研材料。我领了任务后，在随后考察调研武汉钻石艺术博物馆、武汉李庄古建筑博物



2013年1月3日，武汉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提案咨询会现场，邓超华委员（右）接受武汉电视台记者采访

馆等民博的活动中，更加用心听取委员们的发言、文化部门的通报、馆长们的情愫和苦处，并及时提炼归纳。我开始主动考察省博、市博等公办博物馆，比较高校博物馆、行业博物馆的差距，更加清晰了调研思路。汇总各方面的资料后，我动笔撰写出了《关于加快我市民办博物馆建设的建议》初稿，对民博的发展规划、业务指导和政策扶持提出了三点建议。材料一次性完稿。

2013年元月3日，由我代表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撰写的调研报告，经专委会主任会议审议推荐，转化为一篇市政协的社情民意，题目是《加强对我市民营博物馆的扶植和管理》，专报给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为助力武汉市民办博物馆的建设出了一份力、建了一次言。

一场对话，情动市长

2013年1月6日15:00，武汉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期间，安排有唐良智市长与

政协委员座谈会，在市政协机关一楼常委会议室举行，有40名委员参加。参与座谈的委员是由各专委会和大会各小组推荐，我有幸被民建界别和文史学习委员会双双推荐参加座谈。会议时长2小时，却有近30位政协委员准备发言，内容按经济、文化、对外开放和城市建设等话题分类。为节约时间，每名委员发言时间不超过3分钟，要求直奔主题，只讲问题和建议。我是文化类第三位发言的，题目是《关于加快我市民办博物馆建设的建议》，指出民博数量不足、影响不大等五个问题，提出统筹规划、人才培养、政策支持和聚集效应等四条建议，得到唐良智市长的点评和肯定。他说：“邓超华委员的这个提案很好！很全！包括了规划、服务、意见和政策四个方面，市政府要采纳。”他还说，“文化是大事，我一直关注，（民博）没有统一的规划，今后更多的是民间的（博物馆），我到过税博，知兴衰。市政府要出台（民博）《意见》，提得非常好。”

1月7日，新浪湖北网聚焦2013年武汉两会，以《两会座谈发言响铃急，唐良智市长追着委员求问题》为标题，写到：“22位政协委员发言，每人限时3分钟，铃声一响，话筒拿走……就在这样紧凑的会议中，市长唐良智还在不停地追问委员：‘具体有什么想法？’‘需要政府做什么？’……谈问题，追问问题，回应问题，2个小时很快过去，座谈会结束，没有抢到发言机会的委员们显得有点急，唐良智市长没有离开，他请政协委

员把材料直接交给他。话音刚落，就有政协委员将纸质建议递交到他手中。”我就是第一位将《关于扶持民办古粹坊博物馆的建议》递交的委员，唐良智市长看后说：“很好！我早就听说了，黄陂有一个古粹坊，会后我一定会去看一看。”

一诺千金，情意正浓

武汉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一诺千金》栏目，在2013年11月中旬播出了一期题为《武汉“草根”博物馆调查》的节目。我应邀参加了录制。

栏目首先播放了三个有代表性的武汉“草根”博物馆的调查情况：一是“武汉达临性学博物馆”，在汉口机场河小天鹅宾馆内，由黄永阶先生于2002年筹建，次年对外开放。博物馆以3500年来的性实物，展示出国内外的性进化与性崇拜历史。馆存藏品1000多件，建馆10年，投入达600多万



2013年1月，武汉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期间，邓超华委员在市长与政协委员座谈会上发言

元,知道的市民不多,但有一次到武汉国际会展中心参加计生主题的武汉人口文化节,参观者达8万多人,成为该展的亮点。二是东西湖区开屏里66号的“武汉三尤酒瓶博物馆”,藏于一栋老旧的住宅里,馆长许三尤从小喜欢收藏邮票、磁卡、门券,延伸到收藏酒瓶,25年收集酒瓶1.3万件,以历史人物造型的陶瓷酒瓶为多,一套“八仙过海”瓶是其最爱,2003年创建该博物馆,全国仅2家。三是汉口沿江大道怡景花园内的私人博物馆“武汉钻石艺术博物馆”,有中外艺术品1000多件,藏品来自澳、法、毛、泰等10多个国家,还有从格鲁吉亚收来的一盏极具异国风情的大吊灯,还有藏文化的人皮唐卡、藏器。

在栏目采访现场,我归纳了我市民办博物馆建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另一位嘉宾、市文化局相关处室负责人孙颖女士对博物馆的申报、政策支持、专业指导等方面做了现场宣传,回答了民众关注的问题。节目播出后引起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市民的关注,市文化局派人登门交流,听取意见,市民朋友来电献策不断。

一份提案,情到深处

经过参加对民办博物馆的考察调研和走访座谈,我了解到当时武汉地区共有博物馆55家,其中国有博物馆24家,高校、行业博物馆17家,民办博物馆14家,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国博为主,行博、民博为补充的博物馆体系。特别是我市民办博物馆发展迅速,潜力很大,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但由于民博产生的历史时间比较短,当时仍处于一种自主生存、自我完善的状态中。民博在管理运行、

业务开展、社会服务等方面较之国博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还缺乏应有的社会影响力,距离市委的要求和市民的需求还有差距。为此,我撰写了提案《关于加快我市民办博物馆建设的建议》。

这份提案经市政协立案(20130443号)后,及时转交武汉市文化局承办。作为武汉市博物馆建设管理的主管部门,市文化局相当重视该提案的办理:先是电话咨询提案原意,然后交流提案办理方案的着重点,数月后相关处室负责人带队亲自登门,通报办理情况,并邀请我到新审批的4家民办博物馆实地考察办理结果。

在提案办理的半年时间内,武汉地区博物馆数量由55家增加到62家,民办博物馆由14家增加到18家,民博藏品近4.5万件,基本陈列有19个,举办临时展览51次,全年开展社会活动62次,共免费接待观众54.8万人次。我欣喜地看到,《武汉市促进民办和行业博物馆发展实施办法(暂行)》出台,充分吸纳了本提案的建议,在土地建设、税费减免、财政金融扶持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对民博和行博的发展制定了扶持政策和激励措施。如在财政扶持方面,对民博、行博定级评估,给予奖励补助,对建馆有困难的给予一次性建馆补助,对年度考核优秀的民博、行博评出一、二、三等奖,分别一次性奖励10万、8万和5万元。并积极扶持已经具备单独建馆条件的藏家设立民办博物馆,开展国有博物馆对口帮扶工作,依托武汉博物馆进行试点。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前,制作出版了武汉博物馆地图第二版,对民博等进行了集中推介,组织推出《走进博物馆——武汉地区博物馆巡礼》临展、巡展,在《长江日报》《楚天金报》等多家报刊上开辟专刊专栏,定期宣传我市民办博



位于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的杨楼子古榨坊博物馆

物馆的资讯。看到市政府文化部门对该提案如此认真地办理，看到我市民办博物馆正以蓬勃之势健康发展，我心中充满着成就感和幸福感。

一列链反，情愫延绵

核物理的链式反应，也可以发生在政协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协商平台中。

一是建言古榨坊博物馆建设。2012年，我在民博调研中慕名走访了位于武汉盘龙城的杨楼子古榨坊博物馆，农民馆长杨德元充满深情地介绍建馆历程及艰难。黄陂古榨坊始于1558年，历时450多年，2006年传统榨坊技艺列入武汉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列入湖北省“非遗”名录，传说古榨的小麻油曾为明代皇家贡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木榨机，现在依旧可以用来榨油。在有着3500多年历史的武汉城市之根——盘龙城遗址边上，古榨坊民博尤为醒目。该博物馆于2009年建设开工，但至2012年历经四年还没有完全建成，有些珍贵藏品还被盗走，急需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促进该民博早日建成。

2013年元月，我撰写了提案《关于扶持民办古榨坊博物馆的建议》（20130680号），转交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黄陂区政府承办，得到市规划局马文涵、严春副局长和黄陂区分管副区长的督办，

在规划土地、资金、人才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我也收获了当年民博和榨博双提案办理的喜悦。

二是建言行业博物馆建设。2013年3月28日，我参加了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组织的行业博物馆建设座谈会，听取了市文化局对我市行博建设情况的通报，聆听了二七纪念馆，中南民族大学博物馆，东湖梅花、荷花博物馆等12家行业博物馆负责人的座谈发言，信息量大，激发了我很多的思考，收获颇丰。结合对行博的走访和思考，我撰写了《关于加强武汉市行业博物馆建设的研究》。2013年11月11日，在武汉市政协“文化五城”建设民主评议会上，我以委员身份发言，肯定行博建设的成绩，提出行博建设的六方面思考和四点建议，助力我市行博发展。

三是建言交通博物馆建设。九省通衢的武汉，从1574年官渡兴起至今400多年，有“天堑变通途”的武汉长江大桥，有改革开放中的多座跨江大桥，还有四层环城公路网、长江第一隧道、地铁等等，标志着武汉交通快速发展，四通八达，留下了很多辉煌的痕迹，沉淀着许多交通人的精

神财富，武汉需要有一个交通博物馆来承载历史，激励当下，展望未来。我于2015年撰写了《关于建设武汉交通博物馆的建议》的提案（20150312号），提出了选址汉口老火车站等地兴建，高规格设计布局，广泛收集文物、丰富馆藏，建成交通教育基地等建议。提案由武汉交通运输委员会承办，武汉市交通科学研究所书记、所长李志强，副所长周汉华等同志上门拜访征求提案办理意见，相谈投机，他们都感谢政协委员助力交通博物馆建设。

四是建言武汉桥博园建设。武汉市自古至今共计有1000多座桥，享有“桥梁之都”的美誉。建成园博园之后，有必要依托中铁大桥集团等多家国内外知名的桥梁设计机构和施工企业，建设一个“武汉桥梁博物馆”，承载桥梁史，传承桥文化，带动桥旅游，激励青少年投身桥未来。为此，我撰写了《关于建设武汉桥博园的建议》的提案（20170260号），得到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青山区政府的重视。提案回复中写到，“我局认为适宜在青山区域结合‘武湖绿楔’生态廊道选址建设。”“由青山区政府组织开展桥梁博物馆选址规划论证……上报市政府同意后……办理相关规划手续。”青山区政府也积极办理论证，编制了桥博园系列项目规划书。可喜可贺，令人欣慰。

五是建言修建工业博物馆。早在2007年，我就撰写了《关于修建工业博物馆的建议》的提案（20070540号），呼吁在具有“十里钢城”之称的青山地区保护历史建筑，保存工业遗存，修建工业博物馆。武汉市文化局在武文政函〔2007〕75号《提案答复》中写到：“建于1956年的青山一冶机关大院、红钢城八街坊等，市房产部门拟将其确定为优秀历史建筑，是在城市建设改造中的

重点保护对象。”“市政府对青山区旧城改造中其他‘红房子’的拆留很重视。李宪生市长曾到现场进行过考察，责成市房产管理部门尽快拿出保护意见……优秀历史建筑的使用，可以开辟公益性的博物馆。”“目前，武钢集团正把具有代表性的老建筑武钢剧院改建成钢铁博物馆……再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全过程。”“钢铁博物馆”随后建成，开始了工业遗存保护工作。2013年年底，我还在青山区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中撰写了《关于建设工人版画博物馆的建议》，建议重视“中国一冶工业版画”这一独特的工业文化符号的保护，得到青山区政府的重视。由武汉市青山区文化体育广电局积极承办，确定以一冶版画院区域为载体，打造“青山区版画院子”（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办理方案。

回顾过去，感情至深。我担任五届武汉市政协委员的23年里，总有几件难以忘怀的记忆。建言民办博物馆，助力文化事业发展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些不仅仅是委员个人的行为表达，更是政协委员们不忘合作初心、肩负使命担当的作为体现。委员们用一份份的提案、社情民意，用一次次的发言协商认真履职，贡献韶华，促进社会的发展。

（邓超华：十一届武汉市政协常委，九、十、十二、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委员，青山区政协原副主席）

在“人民大学”中倾听与思考 ——我的社区抗疫叙事

◇ 杨德红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袭武汉。1月23日，为了全国人民的安全，武汉实施“封城”管理。1月27日晚，我作为江岸区人大工作人员接到区委通知，要求我第二天到佳园小区报到，执行下沉社区任务。说实话，我还是比较担心害怕的，因为我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属于典型的易感人群，而且感染后死亡率高，家人也很担心。但是国家公务人员的职责和使命容不得我过多的思考，1月28日大年初四，我早早起来步行40分钟来到我的岗位——丹东社区报到，2月初到佳园小区值守点进行小区防控。经过简单的交接和上岗培训，我就开始了70多天下沉社区的生活。这70多天如同上了一次“我的大学”，深刻体会了政府决策的艰难、社区干部的不易以及普通市民的苦痛，“只有强烈地满怀热情地关爱人，才能从这种关爱中吸取必要的力量，寻找和领悟生活的意义。”作为一名市、

区两级政协委员，如何让我们的抗疫工作更有序有效，如何减少人民生命和财产损失，这就需要我更加用心地观察和思考。

最开始的15天应该是整个防疫过程中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候。刚到社区，每天都有居民来求助住院床位，希望能得到及时医治。群众也处于恐慌状态。而此时的本地电视台还未集中力量开设抗疫专题频道，发挥宣传主力军作用。作为区民进的主委，我每天都会接到五六个会员要求住院床位的求助信息，而医院则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随即，我和其他委员一起写下《关于武汉电视台做好疫情防控宣传工作的建议》《建议尽快缓解专用病房问题》《关于腾出党校作为隔离收治场所的建议》《注意现钞交易传播源的问题》《对长期抗战疫情的几点建议》《落实“四集中”防控措施，必须规范管好市级统筹医院》等数篇社情民意，悉数被采纳。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感染患者越来越多，患者收治依然困难。有一次，一位居民向社区求救：他弟弟和弟媳高烧很长时间了，能不能把患病的弟弟和弟媳隔离？侄儿子目前还没感染，他弟弟说他们夫妻救不了就算了，一定要保住孩子。我几乎是噙着眼泪听完这段求助信息，当时就心急如焚。通过征询相关专业人士意见和与社区干部、居民交流中发现，最好的

办法是将“四类人员”集中收治，才能够缓解目前的窘境。我连夜写下《武汉新冠病人出院标准急需修改，以便提高床位周转效率的建议》《关于进一步做好隔离群众和收治轻症患者就医工作的建议》，只希望被感染的患者能尽快收治，尽快用良好的医疗资源将患者医治好。

2月初，由于各大商超均没有关门，百姓在恐慌的心态驱动下纷纷奔向超市抢购囤积各种生活物资，这种大量人员聚集的情况肯定会对防疫工作不利。我值守的佳园小区旁边正好有中百仓储和中森华农贸市场，我每天都去这两个点位进行调研，与市民交流。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我写下《关于改变购物方式的建议》《防止疫情的扩散，建议为居民提供多样采购方式的建议》，建议以社区团购为主，减少人员外出和聚集，减少人员感染风险。这些建议很快被采纳了。

2月中旬，事情出现转机。省、市医院的收治力度不断加强，我下沉工作的重心



2020年2月2日，杨德红委员（中）率江岸区民进志愿者向街道和医院捐献防护服

转移到普通市民的生活方面和如何形成合力加强管控力度上来。在社区管控中，我发现社区和下沉干部的力量依然薄弱，我立刻在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微信群呼吁继续发挥红色物业、红色头雁作用，让党员、志愿者参与社区工作。对于还未成熟的思考就及时用手机记录整理：团购中群众反映菜价太高吃不起，于是我就想能否实行菜价补贴；有人反映无底薪，长期封控将会使生活十分困难；还有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值守时，一个外地人到门口问小区招待所能否接纳他人入住，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被困在武汉回不去，原来的经济型酒店由于要做隔离区，不能再住了，高档酒店住不起，低档的又没开门。看着他离去的身影，我心急如焚，连夜将实行菜价补贴、为无底薪人员或新困难群体购买公益岗、对滞留武汉的外地人员进行排查帮助的建议写了出来，形成了《关于当前封闭小区管理下出现的几个问题的建议》和《关

于精准化排查现阶段每日新增病例的建议》的社情民意，供指挥部参考。

忙碌的一周过后，武汉市疫情出现了转折。20日，首次出现出院人数大于确诊人数，“四类人员”的收治也进入到决战决胜阶段。当社区周书记高兴地告诉我，社区登记在册的“四类人员”基本收治到位，而且收治进去的患者大多数病情有所好转时，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由于武汉疫情严重，复工推迟，复学推迟，小区封闭管理将延续。这时候，社区工作最大的问题不再是“四类人员”收治问题，而是百姓的日常生活保障。超市、菜场没有开，老百姓需要的日常物资团购无法满足、个性化的需求无法达成、身患疾病的人群无法就医等问题集中凸显出来。社区工作人员每天都拖着疲惫的身躯尽可能地满足百姓需求，一旦有满足不了的要求，即便尽量解释也可能得不到百姓的理解。这些我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关于给社区工作人员更多关爱政策及帮扶措施的建议》是我连夜写出的社情民意，只希望能够为社区工作者们减轻点负担，让他们的压力小一些。建议一经提出就得到很多街道领导的肯定和赞许，此后中央到地方对社区干部的关爱和制度性文件也相继出台了。

以建设者和参与者的眼光去观察、去发现抗疫过程中的不足之外，进而建言献策，这是我下沉社区参政

议政的基准点。当工作重点从收治转向小区防控时，我在社区值守中了解到，有个孩子手摔断了到儿童医院救治，孩子要先做核酸检测，等结果出来后再打石膏固定，我就觉得这种流程存在一点问题。3月20日晚上值班时，一个居民向我求助说，孩子头摔破了在流血，需要去医院救治。按当时的就医流程需先报社区同意后，社区派车派人陪同才能看病。但此时社区无车无人可派，家长打电话向医院求救，我二话不说立即开车把孩子送到医院进行缝合，幸好及时，不然这女孩脸上会留下疤痕，搞不好会影响她以后的生活。小区值守下班后，我又赶到医院门口把孩子送回家，安顿好孩子，我顾不上给车消毒就立刻写下了《关于同步恢复非新冠肺炎患者诊疗流程的建议》。

我是一名市政协委员，也是民进江岸区工委主委，疫情当前我应该带领我们的会员为武汉战疫作出民主党派的贡献。1月27日，我就号召民进江岸区工委全体会员向一线捐款，两天时间共筹集捐款10万余元，用于购置2500套防护服，送往战斗在



2020年2月10日，杨德红委员（右）在值守点为小区居民测温

一线的街道工作人员手中。
2月2日，因为武汉各区域仍处于封闭状态，厂家不能送货，我带领班子成员开车前往新洲的防护服工厂，提取2500套防护服。随后兵分多路，把这些物资直接送到了江岸区急需的10个街道和市第八医院，有力地支持了一线防控工作，缓解了他们的压力。3月初，广东徐闻县的村民积极向江岸区捐赠蔬菜水果，但由于道路封闭和疫情管控等原因，增加了村民货物运输成本。江

岸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得知情况后，向社会发出捐款倡议，帮助献爱心的徐闻县村民减轻压力。由于会员刚刚捐过一次款，为了不增加会员负担但又能解决问题，我创新了捐款形式——民进一小时捐款活动，发起倡议并带头捐款。会员们积极响应，在短短的1个小时里就募集到1.16万元，缓解了农民的运输成本问题。其间，还有其他兄弟省份的民进会员主动提出向我所在的江岸区医院和社区捐献物资和钱款。我主动协调相关部门和医院，建议兄弟省份民进会员采取定向捐赠方式进行，做到每笔捐赠均能落实到位，收到各方好评。

4月8日武汉成功“解封”，千万武汉市民盼望的春天正迈开脚步向我们走来。这是武汉千万市民齐心协力、共同抗疫取得的胜利，其中的精神非常值得我学习。尤其是我下沉社区的70多天里，仿佛再上了一次“我的大学”，把参政议政的阵地前移，和群众接触，倾听民声，了解民意，完成了20多篇社情民意和参政议政的建议。



2020年3月16日，杨德红委员（右一）向下沉街道捐献消杀物资

通过这段时间的工作和思考，希望政府可以进一步激活各方力量，夯实社区治理基础，完善城市功能的末梢血管，让城市更具竞争力和活力！

（杨德红：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委员，江岸区人大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汉阳有个两湖商店

◇ 邵清泉（口述） 邵碧玲（整理）

61年前，两湖副食品商店作为武汉市商业界的代表，进京参加了全国群英会，在社会上引起关注。

其时，两湖商店在汉阳已非常有名，为市民喜闻乐道。改革开放之初，两湖商店就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商业先进单位”。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它都是武汉财贸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是武汉商店发展的典型样本。

从1957年到1974年，我在两湖商店担任领导工作17年，市委曾先后六次发文号召全市各行各业向两湖商店学习。我本人也被商业部授以“全国优秀商业干部”“优秀政治指导员”，荣获“武汉市先进工作者”等光荣称号，多次代表两湖商店出席省、市劳模大会。1965年，我赴北京参加全国商业政治工作会议，受到中央领导的表彰。

1974年被破格调到汉阳区二商业局担任党委书记、局长，先后任区财办主任、商委主任。1990年退休。现将两湖商店与共和国同行的创业史回顾如下，以飨读者。

迁址两湖会馆而得名

两湖副食品商店地处鹦鹉洲洲头地区。清朝道光年间，湖南竹木商将竹木运到鹦鹉洲，逐渐繁荣起来。到新中国成立前夕，鹦鹉洲洲头地区有为竹木搬运工人服务的杂货烟酒店28户，多是些资本微薄的夫妻店。

1951年3月，这里建立了武汉市第八员工消费合作社，即两湖副食品商店的前身。该合作社由两湖竹木搬运站创建，社址设在一个竹木会馆内，与著名的两湖会馆隔十来家之远，第一任主任系两湖竹木搬运站

的彭发兴。这年下半年，汉阳地区成立了第六区消费合作社，领导各单位自办的消费合作社，原第八员工消费合作社由其分管。1952年下半年“三反”运动后，第八员工消费合作社不断发展，将社址迁到两湖会馆，称为“第六区消费合作社两湖门市部”，两湖商店自此得名。

两湖会馆的“两湖”并非指湖南、湖北。原来湖南的竹木是按湘、资、沅、澧四大河流区分的。湘、资两水所产竹木通过洞庭湖东边运来武汉，统称东湖木；沅、澧两水所产竹木由洞庭湖西边运来武汉，故称西湖木。湖南人在鹦鹉洲洲头共创两湖会馆，以示团结和睦，为竹木商最上层领导枢纽。据有关资料记载，“两湖会馆集全洲会馆之大成，尤为壮观。”两湖商店初建于此，可谓得天独厚。

两湖商店属集体所有制企业，是综合经营的合作店。主要经营商品有烟、油、盐、酱、醋、糕点、粮食、百货等。初创时未经营白酒，因为当时酒均为私人所酿，国家不准合作社进私人酒。成立第六区消费合作社后，各合作社才经销白酒。白酒经销对搬运工人可谓是雪中送炭，也大大增加了商店的销售额。

合作社的资金，一部分为两湖竹木搬运站所投资金，另一部分为工人私人所投股金。入社时，每人收股金1.4~4元，入股后，每人领取股金证一个。合作社只对本搬运站入股的工人进行供应，工人每次购货都比外面商店便宜1~2分钱，工人对这种供应方式十分满意。第六区消费合作社设有组织股，任务之一就是帮助基层合作社在居民中

发展社员，每个居民入社股金4元，由于合作社具有供应商品方便、价格低等优点，居民入社人数剧增，这样一来，合作社的资金多了，供应范围扩大了，发展十分迅速。

合作社的货源，完全由上级按计划分配，直接由市消费合作总社提供。市消费合作总社在位于汉口的长江食品厂，各种货物用船装，由汉水经长江运到两湖消费合作社，再由搬运工人搬进合作社。汉阳区消费合作社成立后，主要货源仍由市总社提供，由区社统管，部分商品由区社外采提供。

两湖消费合作社初期管理十分简单，社内设主任、副主任，核算员各一人。主任负责日常事务处理，各种支付审批以及社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进销业务由副主任分管。核算员负责进销存的核算，各种支出、收入、月底盘存等项账务工作，核算形式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1954年大水时月湖堤决口，汉阳一片



1970年，邵清泉（右四）在两湖商店召开的工人、农民及居民代表座谈会上发言

汪洋，所余只有龟山、凤凰山、陡码头、三槐一岭等小部分高地。所有灾民和被淹的商店都迁至以上地区。两湖消费合作社迁到陡码头营业。由于灾民比较集中，商店营业情况比较好。年底，第六区消费合作社被撤销，各消费合作社交汉阳区零售公司管理。1955年年初，合作社将工人、居民入股资金一一退还，退股金时略加利息。自此，两湖消费合作社更名为两湖零售商店，其经济体系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这期间，两湖商店已成为核算中心，下设崇善、荒五里两个分店。三个店每月进行一次月终盘存，由两湖商店将每月营业情况汇总后报区零售公司。

1956年以后，为了适应鹦鹉洲洲头地区工业的迅猛发展，两湖商店发展成为综合性的商店，经营范围有所扩大，经营品种有所增加，除供应副食品外，还有百货、蔬菜、饮食、日杂、粮油等商品，货源主要由市公司每月按计划下拨，还有部分外采。

从提篮送货到“经济户口”

1958年，武汉在鹦鹉洲洲头江边建设港口，各种工厂也应运而生，商业发展亟待跟上形势的需要。当年2月，汉阳区成立城市服务局，我从局财会科调两湖商店工作，任商店主任。我根据洲头地区商业网点少、供应范围广的实际情况，同广大职工一道，采取提篮送货到工地的便民服务措施。后来又“篮子服务队”改为流动售货车的供应方式，大大方便了群众的购买，深受消费者欢迎。

由于两湖商店的服务工作卓有成效，1959年我代表武汉市商业界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群英会。

为了使流动供应制度化，1960年，两湖商店指定专人担任流动售货员，杨汇珍成为第一任流动售货员。流动售货员迎朝阳、送晚霞、顶烈日、战寒风，送货服务到工地、田头、部队、居民群众中，把温暖和方便送到千家万户。

1957年之前，市场上各种商品比较丰富，商店供销两旺。1958年后，物资逐渐紧张起来。随后，不少副食品都执行计划供应。1961年年初，食盐也执行计划供应。国家采取了部分副食品调价政策，如黄鹤楼瓶装酒平价每瓶1.34元，高价为6.00元；苹果每斤从0.60元调到1.00元等。

1960年，商店销售额达2048431元，利润69789元，费用为67040元。1961年，两湖零售商店将蔬菜、餐馆、粮食等分出，成为以专营副食为主的商店，当年销售额为92万元，上交利润为2.5万元。纵观两年经济指标相差甚为悬殊，除由综合店转为专营副食品店的原因外，1961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也由此可见。当年，两湖商店与崇善、新村、瓜堤、潜龙等店并为一个核算点，供应范围扩大为南北东西约6平方公里，供应户数为10300余户，人口达44500余人。

由于自然灾害，各种物资供应相当紧张。时逢城市人民公社蓬勃发展，生产集体化和家务劳动社会化逐步形成。上级有关部门要求国营商业和服务部门相应改进本部门的工作，贯彻合理分配商品、方便群众购买的方针。两湖商店学习重庆市上新街副食品商店的先进经验，采取了“经济户口”的保障措施。“经济户口”的主要内容包括40个方面，从住址、职业到家庭人口，从老弱病残孤、军烈属到孕妇、产妇、单胎、双胎、有奶、无奶以及某些个人的嗜好，如抽烟、喝酒等。由于建立了全面细致的“经

济户口”，就能心中有数，力争主动，把商店货源与群众需要紧密结合起来。

建立“经济户口”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先在每一个管理区的范围内建立代销点，同时建立民主管理小组，民管小组根据国营商店“两公开”“三交待”（即公开库存、分配比例，交待供应原则、市场情况、政策宣传内容），研究分配方法，民主评定供应对象和数量。“经济户口”的建立，为缓和当时商品供应紧张形势、合理分配商品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一做法受到了省、市有关部门充分肯定。1960年6月22日《武汉财贸》载文介绍了两湖商店建立“经济户口”的经验，并在其他店得到推广。

1959年，两湖商店因杨泗港建设的需要，从两湖会馆迁至建港新村营业。由于该地巷道狭窄、交通不畅，群众购买不便，就于1964年3月迁至鹦鹉大道交通部第二公路勘察设计院一楼门面营业。这里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对两湖商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工农兵监管会在全市推广

1966年“文革”开始，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两湖商店职工坚守工作岗位，供应工作基本正常。但在形势最严峻的时期，流动供应和一部分便民措施一度中止。1966年的费用水平达5.92%，为历史最高，而上交利润却低至不到2万元。

1970年元月，两湖商店学习天津汉古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两湖商店书记邵清泉同志

药店经验，成立了工农兵监督管理委员会。这是工农兵群众对商店进行监督管理的机构，其成员主要由工农兵代表、街道居民及商店职工代表组成，主任是工人代表赵德云。尔后六个分店都建立了工农兵监管小组，工农兵代表由12名增加到55名。主要任务是监督商店的服务方向，加强职工思想教育，提高服务质量，改善服务态度。监管会的经验首先在汉阳区各店推广，随后市内不少店也成立了监管会。这是继1960年建立“经济户口”后，两湖商店的经验又一次在全市财贸系统推广。

在监管会代表建议下，两湖商店于1976年年初制订了“全开”“七供应”“一关”的服务工作制度。“全开”就是在一年365天里，不论是学习开会、节假、盘存，天天开门营业；“七供应”是门市正常供应11小时，根据本地区工农业生产的情况开设早晚服务部供应3小时，偏僻地区实行流动供

应，离店较远的工厂组织代销供应，重点服务对象上门供应，日常需要商品定期下厂、下农村供应，紧俏商品下街轮流供应；“一关”就是关死“后门”。这一制度的执行得到了工农兵监管会的监督和支持，受到人民群众的好评。1970年5月20日《长江日报》刊载了两湖商店这一便民服务制度。

1973年，汉阳区成立了一、二商业局，局下成立了副食品管理处。由于机构变动，瓜堤、新村、潜龙等店与两湖商店合并，与此同时商店领导力量得到了加强，党支部书记仍由我担任。在业务和经营管理上，配有胡竹斋、胡方先两位得力的主任。当时商店不论是柜台服务工作，还是经营管理、完成计划等方面都处在鼎盛时期。

1973年4月2日，武汉市二商业局向全市财贸系统发出“关于开展向两湖副食品商店学习”的通知。当年3月31日、4月1日和4月2日的《长江日报》连续在显著位置报道了两湖商店的先进事迹，全市财贸系统掀起了学习两湖商店的热潮。据《长江日报》报道，“三月份以来，到两湖商店参观的人川流不息。”1973年7月，两湖商店代表光荣地出席了武汉地区服务工作先进集体代表大会。

为了更好地做好服务工作，商店党支部将数年来服务工作的经验加以总结提炼，归纳为“柜台服务工作十项要求”：“服务要周到，接待要主动，说话要和气，挑选要耐心，宣传要正确，买卖要公平，陈列要醒目，商品要卫生，操作要快准，购买要方便。”除此之外，党支部还向全体营业员提出接待顾客要做到“四个一样”，即“大人与小孩一样，忙时与闲时一样，大生意与小生意一样，买与不买一样”。这些经验在全市“学两湖”的活动中得到了推广和应用。

1975年2月15日，市委财贸政治部向中共武汉市委呈送《关于开展向两湖副食品商店学习的报告》，市委立即发出文件，批转了这个报告。文件中赞扬“两湖副食品商店是我市财贸战线一面红旗”，要求全市财贸系统“充分发动群众，对照两湖商店的先进经验，找差距，订措施，扎扎实实地学，认真把经验学到手。”武汉市委文件的发出，把“学两湖”的活动推向了高潮。1975年，两湖商店各项计划指标都完成得较好，费用水平为3.3%，创历史最低水平。

两湖商店根据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店少、供应范围广的特点，在多年的服务实践中创造出许多便民经营方式，到1975年归纳为“五主五辅”：即以副食为主，兼营其他为辅；以门市为主，四下服务为辅；以供应为主，连带服务为辅；以自销为主，代销为辅；以经营为主，兼代修理为辅。其具体内容和做法是：

一、商店主营粮、盐、烟、酒、糕点、水果、罐头等副食品。根据附近其他行业少的情况，商店兼营日用小百货、文具纸张、图书和陶瓷、土产等商品。

二、商店以门市为主，根据网点供应范围广、群众购买不便的实际情况，进行流动供应，服务到工厂、农村、部队、居民委员会，把方便送到千家万户。

三、凡在供应工作中有连带服务的项目，营业员尽量做好。如顾客买酱油无瓶塞，营业员就主动配塞；售自行车胎蚂蝗皮，营业员就负责安装打气等。

四、商店销售计划的完成，主要靠自销。但是为了方便群众和超额完成计划，商店创办了代销点。20世纪70年代，两湖商店供应范围上起荒五里，下至潜龙街，在10多里长的地区内仅有6个副食品商店商业网

点，远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两湖商店先后在工厂、农业生产队、居委会组织了21个代销点，代销员主要来自工厂的门卫、退休老工人，农村年纪较大的社员以及居民中的闲散人员。货源由商店提供，代销点收3%—4%的手续费。代销点受到了群众欢迎，特别是方便了三班制工厂的工人，他们赞扬说：“代销点真方便，购买不出门，服务到身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搞活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各单位自办的商店和私人商业日益兴起，代销点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失去了存在的必要，逐步被取消。

五、两湖商店在以经营为主的前提下，为了方便群众，增设了修理服务项目，如修理钢笔、手电筒、代划玻璃等。

“管段服务”

“管段服务”是两湖商店1977年5月份所采取的一项便民供应措施，是1960年“经济户口”的继承与发展。

粉碎“四人帮”后，两湖商店遵照党中央关心群众生活，把市场安排好的指示，首先对商店管辖区内的工厂、农村和街道居委会进行全面调查，按厂建立经济卡片（经济卡片主要记载工厂人数、发薪日期、工厂食堂就餐人数及个别人的特殊需要），按居民小组和农业生产队建立商业联络员，然后将管辖区划为10个地段，每个地段由商店选派一名营业员担任管理服务。管段服务员的主要任务是深入群众，摸清

需要，主动送货上门。由于管段服务员做到了心中有数，从而使商店服务工作越做越主动，越做越便民。

当时，两湖商店党支部领导、职工结合商店在经营管理上出现的漏洞和柜台纪律上存在的问题，于1977年5月制定了“五不柜台纪律”：“不擅自离柜，不争柜，不带亲友上柜，不在柜上吃早点，不说闲话”。

1978年4月，两湖商店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商业先进单位”。全店干部和职工在荣誉面前不骄傲自满，主动查找服务态度、服务质量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十个怎么想”的讨论：

1、当你临柜购买商品等了好久，营业员不理睬时，你怎么想？

2、当你赶车赶船赶上班，又急于先买点东西，而营业员要繁不慢时，你怎么想？

3、当你挑选商品时，营业员不耐烦要态度，你怎么想？

4、当你购买商品价值小、数量少，营业员接待不热情时，你怎么想？



1978年，武汉市委书记刘惠农（左三）视察两湖商店，左二为邵清泉同志

5、当你向营业员询问有关商品知识，营业员不耐烦时，你怎么想？

6、当你购买商品但路途远，营业员捆扎不便携带时，你怎么想？

7、当你购买东西后，发现短斤少两、价质不符时，你怎么想？

8、当你由于特殊情况，不能到商店买东西，而又无人帮助时，你怎么想？

9、当你购买某种商品来店多次，都没有买到时，你怎么想？

10、当你上班前或下班后，需要买点东西，而商店关着门时，你怎么想？

“五不柜台纪律”和“十个怎么想”在《长江日报》刊载后，职工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明显改善。

1981年6月，新村、瓜堤、潜龙等店再度分开。两湖商店原有的代销点被取消，出现了一批厂办商店和个体商贩，打破了原先独家经营的局面。为了适应新的形势，1982年，两湖商店进行了全面整顿。在服务工作上开展外学赵春娥、内学郑桂芬的活动。在经营管理上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明确了责任制。在组织上加强了商店领导体制的整顿和建设，领导成员更加知识化、年轻化，提高了领导班子政治和业务水平。从1976年到1983年，尽管社会上有多渠道的经营，但两湖商店的计划指标仍年年超额完成。1981年，两湖商店被武汉市人民政府授予“红旗单位”。1983年，被市财办评为“文明经营最佳商店”。在市公司开展的“全市优质服务竞赛”中荣获第二名。

从1960年到1984年，两湖商店流动供应站从未中断，共有15名同志担任过流动售货员。流动供应不仅方便了群众购买，而且为商店培养和锻炼出一大批骨干人员。

他们不仅为两湖商店发展壮大、步入商业系统先进行列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还为兄弟商店提供了骨干力量。他们中的佼佼者层出不穷：

王秀英，1960年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

郑桂芬，1972年参加工作，被人们誉为“铁姑娘”，曾先后被授予省、市劳动模范，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等光荣称号，被选为市、区人大代表。

杨元珍，1978年被武汉市人民政府授予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曹友生，被武汉市人民政府授予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

1983年，两湖商店有职工88人，其中党员6人，占7.2%；团员14人，占17%；青年职工69人，占83%。1983年销售额达207万元，上交国家利润8.29万元，成为洲头地区副食品供应的主心骨。

1984年，两湖商店由只有消费合作社发展成为大型国营副食品商店。下设钢丝绳店、新店和新建村三个分店，以两湖商店为核算点，担负洲头地区12个居民委员会、30多个工厂、2个农业生产大队约2万人的副食品供应任务。从1978年至1988年11年中，两湖商店销售、利润、费用三大计划指标，都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

如今，两湖商店原址仍在，改成了由私人承包的“两湖平价超市”。

（邵清泉：汉阳区商委原党委书记；
邵碧玲：汉阳区政协文史教卫委员会主任）

汉味糯食小吃盘点

◇ 罗建华

在物资供应紧张的年代，米精贵，糯米更精贵，只有到过年才会凭证供应几斤糯米。这时候，老城区的街头巷尾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旧石磨悠悠转着，粘稠的浆水汩汩而出；粗树枝桠或木梯横杆挂上布袋吊浆，沉甸甸地往下滴水；门板晒开滤干了的汤圆粉子，由老太太掰成一块块奶糕大小……生活的喜气在阳光下一缕缕升腾。

糯米虽然精贵，但在武汉小吃中，糯食小吃从不缺席，也远远不止汤圆。闻名四方的豆皮，两面煎得金黄，内中包裹的是什？软烂酥香的糯米。糯米中，点缀着肉丁、笋丁、香菇丁、豆腐干丁，再撒上一把嫩绿的葱花，喷香扑鼻，早把你的胃口吊起来了。即便是烧麦、汽水包，外皮虽是面粉，内容和豆皮一样，还不是糯米唱主角吗？

糯米做的食物总是那么精致，上档次又饱口腹，很平民也有点贵族气息。正因为它雅俗共赏，一把米衍生出好多花色品种：汤圆、糍粑、年糕、油香、油糍、酥饺、欢

喜坨、糯米鸡、糊米酒、糯米包油条、糯米灌肠、糯米粉子……还真叫一个眼花缭乱。

在武汉，颇具特色的糯食小吃，至少有以下这么几款，有的已鲜见或消失。

酥饺

酥饺，像油条一样纠缠着炸出来，黄酥酥，胖呼呼，不直接入口，沾了粉子才吃。那粉子也炒得黄酥酥的，拌了白砂糖，在盆里亮晶晶闪烁。刚出锅的热酥饺，丢进去打个滚，稍稍凉一下，送进嘴里外酥内软，还品出几丝酸甜——那糯米是发了酵的。

吃酥饺，麻烦的也是这裹上的粉子，不仅爱在嘴巴粘一圈，还容易洒到衣襟上，弄得吃相难看，因此绝不能大大咧咧。一些女孩子吃起来小心翼翼，斜低着头，轻弯着腰，一小口一小口慢咬，显得格外秀气，不失为街头一景。

据店家说，酥饺发酵工夫不好掌握，

磨米浆又费时费工，远不如热干面“短平快”好赚钱，这大约是街头酥饺摊子稀少的缘故之一。户部巷引入一家，老板多次叫苦，但为了这道汉味特色，一直撑着做。前几年，我去昙华林走走，特意绕路户部巷，打包带两只给妻子尝，结果软不拉叽瘫成一团泥，可见守在锅边现吃才有那个风味。江汉路沃尔玛超市旁美食街，近年有一家小摊支在门口，生意虽不像对门“鲍师傅”那样火得排队，但总在忙活，我每次路过绝对光顾，吃个热呼呼、香喷喷。

糯米包油条

比之酥饺的制作工艺复杂，糯米包油条简单得多，不过是两种食物合二为一，创造出一个新品种，类似外国面包夹香肠的热狗。先用传统木制的甑蒸好糯米，围裹一道棉絮圈保温，案板上摊开纱布，用时揪一坨卷进去，热气腾腾中手背手掌交替操作，一捶一按快速压成饼状，撒上白糖黑芝麻，再掐半根油条包卷起来，麻利地送到你手中。

糯米包油条，米面组合，蒸炸相加，外软内焦，咸甜交融，一物吃出两个品种，兼收两种味道。三眼桥有一家店天天火爆，不仅中老年顾客盈门，还吸引不少帅哥美女，因为老板娘懂得创新，添加了番茄酱、巧克力等风味任人选择。

糯米包油条做法不难，勤快的家庭主妇在家也能做，唯油条需从外面买回去，皮皮的缺了一种劲道。

糯米鸡

糯米鸡，没有一点儿像鸡，也与鸡肉无关。它可以说是一团糯米酱油饭，加了几

星肥肉丁，捏成拳头大小，轻裹一层面糊糊，放进油锅炸。它的外表，不像欢喜坨圆润光滑，而是疙疙瘩瘩、毛毛糙糙，令人联想到一种水生植物“鸡米头”，这大约就是它大名的来历吧。

糯米鸡墩墩实实，很饱肚子，味道的关键在于肉丁酱油是否调拌到位。掰开，油汪汪、湿润润的，眉开眼笑；白花花、硬铮铮的，那脸便黑了。对不起，换货，狠一点的少不了骂骂咧咧。有的店家生意红火，那是做得地道，舍得用卤味肉丁和卤汁拌和，比酱肉包子还好吃。

如今，鲜有早点摊卖糯米鸡，大多是傍晚之后临时出摊，以藕蟹、苕面窝、糯米鸡一类特色小吃，招徕下班路过解馋的老食客。武汉四中对面，简易宿舍地铁站口有这么一个小摊，一对老夫妻经营了七八年，主打这三个品种经久不衰，时常被上晚自习的学生打围。

欢喜坨

欢喜坨，圆圆滚滚一个球团，长得像笑口常开的弥勒欢喜佛，所以有了这么一个人见人喜的名字，岂不叫人欢喜？有的叫麻团、麻圆，那就逊色多了。

欢喜坨，内包红糖，外滚芝麻，沸油猛炸，一会膨胀成小球，外壳挺括有嚼劲，内中松软可口，这是它胜出油香太实的优点。它要趁热吃，不然软塌塌的瘪了，既没看相又不好吃。吃时也得当心，不能让糖心迸出烫着嘴，滴到衣服上更有损形象。

1982年我旅行结婚去上海，在南京路偶见一家餐馆门口摆着一种油炸食物，模样和欢喜坨相似，名字也是异曲同工的“开口笑”，引起兴趣买了几个尝尝。它比欢喜坨

小了一圈，个个像石榴炸开一道笑口，着实让人见了一乐。不同的是，它由面粉制作，实心，没有糖馅，入口泡酥，更像副食品店的点心，算是欢喜坨家族的远房兄弟吧。

后来，欢喜坨销声匿迹，变身为大麻圆，内中不包糖，不知用了什么添加剂起作用，膨胀得只剩一层皮，个头大得不亚于小皮球，香港路蒙娜丽莎餐厅做得颇有人气。我们报社餐厅外包，主食拿它当“卖点”，大大气气、有型有款，招待客人常常推荐。一次，主管宣传的高层领导咬一口后，见它泄气般马上瘪了，戏言：“就像你们头版有时写的社论，又大又空。”宾主一起哈哈大笑，总编辑连连点头表示接受批评。

糊米酒

糊米酒在武汉另有韵味。武汉人如果说谁“糊”，就说谁“九分钱一两粮票”，听的人心领神会一笑，都懂这是拐着弯骂人“不清白”。在餐馆的招牌上，糊米酒九分钱一两粮票，价位和一角钱二两粮票的热干面相当。二者若是搭配一起吃，那是能撑饱肚子的，一般为小伙和壮汉所为。

汉口民生路路口工艺大楼对门，民生甜食馆的桂花糊米酒做得最拿手，门口往往排长队。后来好多餐馆都垮了，它却能“全城连锁”，恐怕就有这一碗糊米酒“垫底”。本来，好多早点卖清酒或蛋酒，但还是“清”了一些，永远只能当饮品。糊米酒则不然，稠稠地打了“糊”，有质感，单吃它也可抵一道早点，其中小汤圆经饿。

过去，糊米酒煮在大铁锅或大铝锅中，蹲在炉子上咕咕嘟嘟热气腾腾。那小汤圆，按传统的做法，是将汤圆粉子搓成笔杆粗的长条，再挨着锅用手指一揪一坨，点点如珠

飞到滚开的水中，上下翻滚一会，绽开如小朵棉花略带絮状，沾染桂花添到碗中糊糊汤汤。食客默默排队，乐意观摩师傅下汤圆这一幕，好像比吃它还过瘾，师傅做得也来劲，那架势显摆出一种表演感。如果师傅偷懒，用刀大把切了住锅中一横，谁看谁知不地道，性急的会喃喃咕咕表示不爽。

油香、油糍

油香、油糍留给大家的印象也许淡漠，因它流行时间不长，做的餐馆不多，属于小品种。但吃过它的人说起来，滋味绵长。报社一位老总出生于枣阳，20世纪70年代入伍来武汉，十分中意这两种小吃，并因此爱上甜食，老来好生留恋。

油香、油糍好似一对“双胞胎”，形状一样，个头相同，炸出色泽老红，小巧犹如桃酥。但常吃的人知道，它们内容有别：油香包红糖，油糍包豆沙。说是豆沙，不如说是豆子闷得软烂一些，带有豆壳，攪在舌尖别有醇厚。豆沙有绿豆也有红豆，绿豆的多，若吃到红豆就更觉划算。比之油香，油糍要好吃一些，不仅多一种食材，又是咸酥味，更适合武汉人的口感。

油香、油糍翻炸，一般用平锅浅油，边炸边用锅铲压扁。有的流出糖汁豆汁，炸得结了薄壳，更香更好吃。若是微微炸糊了，溢出焦糖味、豆香味飘拂周围，很是诱人。

炒汤圆、炸糍粑

汤圆哪里都有，武汉人能做出许多花样，不单水煮，不单包馅，可以炸，可以炒。

炒汤圆，很可能是武汉人的发明，闹市街头四处可见，眼下学校门口、地铁站口

少不了它。它麻将大小，并不讲究方圆，置于平锅不断翻炒，滋滋声中慢慢起泡，涌起一堆金黄好似菠萝，周边总有人耐心围观。炒熟了，裹上糖稀子，用竹签穿它六个八个，好似糖葫芦，也像羊肉串，一般当点心吃着好玩。有时猜，后来流行炒小土豆，是不是学的这炒汤圆？

其实糍粑也一样，蒸的、炸的、甜的、咸的、圆的、方的，花样繁多。有一种油炸咸味糍粑，切成较薄的长条油炸，最大特点是外壳粗糙有颗粒感，咬起来精精神神，而内中又较细腻，能拉出长长的丝丝来。有些小摊，炸面窝兼炸糍粑，照顾了大家的口味，也做活了自己的生意。

1978年，一位同学从十堰二汽回汉过年，我在家请大家一聚。老爸端出一盘油炸糍粑，裹了鸡蛋糊的，色泽金黄诱人，当时还很稀罕，大家纷纷伸筷子抢。我灵机一动，喝酒行酒令，把它用于“罚酒”时压酒，借用足球比赛术语称之“黄牌警告”，大家乐不可支，倒期望多多“黄牌警告”，平添了一段趣话。

糯米灌肠

糯米灌肠，顾名思义是将糯米灌进猪大肠中，煮熟、晾干、切片、油煎，块块像藕饼，色香味俱全。它的做法，前工序同糯米鸡差不多，但不用酱油，两面煎黄可蘸酱吃。这道食物，大肠主要起包装物作用，同时增加荤味，煎了颇有弹性，常常佐以下酒。它并非早点，多是家庭主妇做来改善伙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肠一类猪下水，一份肉票能买三五斤，补充吃肉的不足。我老妈冬天买得多一些，洗得白白净净，再用水漂老半天，要么配萝卜煨汤，用以滋补清

火；要么做糯米灌肠，算菜肴也算主食，更叫我们兄妹喜欢。有时，既煨汤又灌肠，一边喝汤一边吃灌肠，最是惬意。想来，这两样都是慢工细活，有多少母爱渗透其间啊！

糯米粉子

糯米粉子，埋一坨猪油，用开水一冲搅成糊糊，香气即刻溢满四方，是那个年代奢侈的“方便快餐”。老妈只要攒够糯米和黄豆，炒熟了找邻居借磨子加工，盛在细瓷坛子里，是我们充饥解馋的最爱。谁上学起晚了，冲一碗救急。看书睡晚了，肚子咕嘟咕嘟提意见，也可宵夜。

下乡当知青，老妈备了五六斤，量太大，同学胖子背到他老妈工作的食堂，连炒带磨，用一个小洋皮铁桶盛装。那时候，家长捎给知青点最多的食物，当属糯米粉子，平素轻易不动，紧要时满足口福兼补充营养。我老爸老妈想得周全一些，捎糯米粉子的同时，加一瓶榨菜肉丝、一瓶花生酱，被称“三宝”，每每捎来都是喜讯，大家跑来多少品尝一点。好友间更无话说，不时打打“牙祭”。

由此盘点一番，生活在武汉有福了。这里地处鱼米之乡，物产丰富，位居九省通衢，物流便捷，既供应充足又广纳天下，带来汉味美食的万般花样。仅这些糯食小吃，甜品如酥饺、油香、欢喜坨等，应是吸收下江风味，兼收并蓄实现了“转型”吧？

武汉人好吃，勤学苦做的品德，开放多元的胸襟，终究获得了四方美食的馈赠，成就了在海内外的声誉。

（罗建华：长江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

昙华林·校园记事

◇ 徐勇民

谁能想到，2020年初阴霾寒冷的冬天，与哪一年都不一样，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轨迹。闭门不出的日子里，我的情感记忆自然回到了曾经的温馨岁月，那里面有我熟悉的校园以及围绕着它的街区，还有几位可亲可爱的大学同学。曾经美好的岁月，在心中，不言谢幕。

昙华林、凤凰山、粮道街、云架桥、胭脂路、华中村，这些地名又是山又是林又是村，城中有连成一片的这般地名，听上去蛮可以会出些诗意来。湖北美术学院在昙华林中，老师后来给自己居所或是一旁的景致起了诸如半亩园、村中村、八分荷塘等等雅号。

昙华林，它的故事或是传说，伴着地脉中的风俗流转、人情事功、文化搏动积蕴回荡，让人有些神往。昙华林——名字好听，写来又好看，用作题日，将要写的人物也可一并攀附上去。

(一)

昙华林历史远比我们知道的要丰富得多。这一带民居平实，在小巷中走上不一会儿，便会有一幢民国初年中西合璧式小楼从逼仄简陋的民舍中露出一截身影，让人诧异好半天。不过若是读了些近代中国历史掌故，也就视为平常了。一些很是别致的建筑，如教堂、医院、公馆、学校、私宅，它们模样依旧，内里却已被掏空，多不再是原来用途了。有的小门终日锁着，让人生出有故事情节的联想。

早期西方传教士、中国共产党人、国民革命政府、学者和商人，还有一代一代操着武昌口音的居民们，在这片城区留下的印记难以磨灭。自辛亥武昌起义以来，中国近代史风云生成盘旋于此，又呼啸至大江南北。

由昙华林向西南方向扩至方圆三公里内，有崔颢题诗、李白不再放言的黄鹤楼，登高极目楚天，方得“唯见长江天际流”。还有不动声色砰然一声枪响撼动千年帝制的辛亥革命起义门。离得不远有立了孙中山铜像的红楼，抱冰堂、长春观顺蛇山逶迤，宝通禅寺附近更有不仅可食可赏亦可作馈赠佳礼的蔬菜珍奇——洪山菜薹等等。不知是依傍长江还是毗连蛇山，昙华林一带树木植被格外滋壮。

历史，其实是书本上或是口传中的年号，在想象中若即若离。虽不可触摸，感受它，却可以实物见证。读书时，问起上年岁的人，说美院所在原是武昌城墙处，此地段挨着忠孝门。当时武昌城，光城门就有差不多10个。

昙华林的故事像是无风细雨洒落小巷，来来去去，坠困融入老宅旧舍的门楣台阶和青石缝里，无法拂去。于是，这些故事在温暖的拥挤中，在无间的芜杂中，将发酵了的味道散漫开来。各式人物纠葛起历史沉重的轰鸣和日常轻松的枝节，一律由岁月拉扯成可供描绘的画面和可以作出的文章。

（二）

家中凭窗外眺，昙华林周边片片林立的广厦好比舞台远景，天际线是很难看全了。白日，可见高大的悬铃木杈上筑有喜鹊巢穴；晚间，校园内黄鼠狼在夜归的车灯前横跳窜跃。夏季，榆树朴树蔓枝横连，浓荫相间；冬日，倔强的树枝刻划在空中交叠飞舞，现出供人品赏或是写生中的画意。

曾记入冬时节，在学校工作了大半辈子且懂园艺的老师情嘱工友，不要扫去落叶，留作来年可沃化为土，复又滋养大树，

春吐嫩绿。果然，经积叠的树叶覆满了树旁几百平米的土地，浅绿、淡黄、土褐……像调色板上排出的色彩渐渐显变，不时见过一些小鸟蹦跳追逐觅食搅动落叶煞是好看。这片土地润养了大树，大树也生出了几代人的记忆。

五黄六月，八分荷塘。夏荷初露，每年都有毕业生们穿了学位袍拉老师一起合影。有一场景记忆中很是抢眼，猜想是因演出需要，学生着五四时期装束，女生素衫黛裙，短发齐耳；男生则清一色制服，单领紧扣，相伴结群，摆出剧照中的青春姿势。阳光透进树叶间隙，忽大忽小一块一块地洒在学生们身上。鸟声破午，云静天高，光影错动，将岁月也恍惚了。

历数一个一个很值得夸耀的校友，无不在此学得知识懂得事理憧憬人生，且知恩图报，将一切又化为新生代的追忆与梦想。校园里，不知曾有多少墨汁流淌，也不知曾有多少油彩堆积，没人去算计，自然也无法算计。渐渐孕育出昙华林的荣誉和居民的得意，在看起来还有些陈旧世俗的街区中敷上了更多理想的色彩。尤为称道的是有了校园里花红柳绿间学生的蹦蹦跳跳，将这里可以列为学问的内容，一一编入自己的论文或是画面，成为学问，这里自然也就有了可以续接上的文化生命力。

（三）

20世纪末，老城区改造，期盼中轰轰烈烈、天翻地覆的城市新生活就要开始。都说风水地脉最宜承接前人所聚灵气，美院内有二幢旧式小楼，钱基博先生曾在此住过，房东们都这么说。经历了这么些年，不知踏上去嘎叽嘎叽的楼板声响扰醒了多少房客

的梦。拆去还是保留，曾引起了一阵子争议。修缮改建后，市政府授予了“优秀历史建筑”匾牌，常见有人群驻足指点，拍照存念。会客室内，镜框中镶有一幅讲义稿，是装修时在老房子顶层阁楼中发现，不知是何年何人所写。稿纸泛黄，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很容易推想出秉烛的先生，一定是心目中当年知识分子的模样，砚台边一定有一杯浓茶，抽不抽烟就不一定了。国事家事心中事都在听窗外蝉噪闻落叶生风日复一日的学问中融化。

这里的幢幢小楼，或红瓦或青砖。白天，高大树荫掩映，光影借着清丽的空气闪烁抖动，极静。晚上，窗帘透出暖光，离得近了，还可听到舒缓的钢琴声和人走动地板上发出的挤压声。若干年前，一名留学生说她想象在中国读书能住上的应是这样的小楼。

如今昙华林，变了些样，已成为颇有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改造者们有意浓缩了建筑中的历史符号，依次排列，颇似拉开了幕帘看真人演出的剧目。记忆在这样的空间中轻易就被短暂错位，引得许多希望将时光混淆的居客游人，甘愿漫步在阳光总照不全的小巷，肩头比着人家的窗户，左看右看，喜欢眷顾以前的时光填充起今天生活中的空白。好比晴天出游、雨天便关窗一样，心境总被调适成与自然状态一致。

（四）

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强劲的生命触须，一下子在各个角落蓬勃起来。好像只要随便搁上一个摊位想做什么生意都可以赚得钱似的。学院周边做小生意的像每年入校的学生一样，越来越多。只是学生面容不太容易记得真切，而周边商铺店主模样倒能



1980年，徐勇民（左）与刘寿祥合影

记得一清二楚。对脑筋灵光的人来说，这真是做生意的好时光。

学院北门外（说是门，逼仄仅同厕门，体态肥硕者出入时旁人还得谦让一番），退休的校工合伙开了一个小店。说是店，其实，只是在门外路口粗大的梧桐树间牵搭起一块雨布，摆几张断腿修复的桌凳。天气爽朗时，雨布看着嫌多余，会被胡乱地扯在一边。日力所及，一个水龙头都不见，谁也不在意起码应有的卫生条件。

下课后，学生老师陆续就餐，坐着站着的都有，大家都乐得在大树下，围着油腻的桌子吃饭，食客夹着筷子口中咀嚼着，与相识的路人打招呼。脚下混着树叶的泥土，

现出自行车车辙，无人清扫。一排排油污的塑料篓内分装着青椒、香干、时令青菜等等，一字排开。一只勺子，配上指缝有黑垢的壮手，师傅不停搅动碗中的精肉、鱼块和佐料，翻来覆去敲击铁锅，声声清脆急促，油珠汗粒交相飞溅。肩头搭着的抹布，弄不清是揩汗还是用来擦桌的。真不知切好成形的菜直接倒进冒着油烟的菜锅前有没有洗净，也看不清盛菜的盘子是怎么涮洗的。反正食客们呼出几个菜名便小酌小饮，将赤着的一只脚移上凳来，埋头扒饭，此番情景想起来都香喷喷的。

周边小楼依旧安静如常。学院喜好命名者管这个小店叫“快活林”，很是贴切。

（五）

我入学时，是20世纪70年代末，学院经常停电。想必供电局看这里民居成片，巷小弄窄，分不出其中还有个清晰的校园，自然划入限电区域。同学们多从家中带上自制油灯。晚上，借灯捻摇曳的暗光，做些功课或记下些学习心得之类。

更多这样的時候，則是相約一呼，背上畫夾，到附近大東門蛇山坡上小旅店中，循着門縫透出燈光的客房，叩門或徑直推門詢問可不可以画像。房客多半一時半會兒聽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或誰給誰画像，常錯愕好長一陣子。那時，人們相互間的戒備心理還相當鬆懈。只要如實先做一番點頭嘻哈的自我介紹，便呼啦啦魚貫而入，黑乎乎坐下一片，哄着來自天南地北的旅客充當模特。有的同學隔遠了，嫌看不清，順手將客人枕頭也墊在屁股下，弄得客床狼藉一片。同學間有約在先，如客人點中哪張画像，則必割愛相贈。結果弄得個個

都擔心自己的習作成為贈品而早早起身溜出或虛意力荐他人。

經常畫燈光下的模特，五官投影形狀和規律已了如指掌。後來，看黑白劇照中漂亮的好萊塢影星瑪麗蓮·夢露面部，尤其是鼻子下呈蝴蝶形標準投影形狀，自然會想起在小旅館中見到類似光影的那一段時光。

（六）

接下來，寫幾位同窗，先說魯虹。

十年“文革”，校園几遭蚕食殆盡，似乎連圍牆也用不着了。相鄰駐軍，森嚴壁壘。周末隔壁院裡經常放映解禁的片子，大部分是黑白的。道聽途說的放映內容，撩惹得我們常借晚自習伺機躍牆借夜暮混入露天影場，有時還須在暗處潛伏好一陣子，這樣的情形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

一日黃昏過後，班上一干人着深色衣褲，專司瞭望的眼尖者壓低嗓門，一聲令下，一團團黑影撲咚撲咚躍牆下去。圍牆另一邊有草地也有泥土，落地的同學顾不上塵土騰起扑入鼻中，分散着一個一個迅速地消失在未開演前的夜幕之中。平常十分精明的魯虹未能及時隱逸，被衛兵當場喝住，令其與拿獲的小毛頭們排成一列。這些孩子在周邊巷子里居住，是在圍牆的另一方位以同樣方式潛入，他們可能連電影名字都未必知道。魯虹自知模樣顯然屬隊列中另類，故竭力佯裝為同類一員，聽任衛兵操練口令呼來喚去厲聲訓斥。夜色中，不知他當時是何種表情作何感想。夜半，同學們相繼回到宿舍，待他返回，還不忘借慰言又有意取笑一番。

畢業創作那會兒，我與他結伴，順長江下游至南京、經無錫、游蘇杭、訪紹興、

取宁波、到定海、登普陀山，再经沪返汉。忆彼时彼景，舟行太湖，烟波浩渺，恍若航海；杭州黄宾虹纪念馆光线幽暗，只得对着画面以文字记录心得；投宿绍兴小镇客栈，与进城卖猪的农民上下铺同居一室，夜半，分不清是人在打鼾还是小猪在哄鸣；普陀山露水中洗漱时静听晨钟，寺庙中年轻的工作人员（还记得喊他小王）盛情款待……氤氲的江南空气一直滋养着这一段记忆。

想起实在不好意思，鲁虹与我因一心想着多走多看节省盘缠，竭力降低出行开支（二年级时，我二人作品参加全国青年美展，应邀赴京观看，为省路费也有逃票的企图），沿途上车不买票渐成常事。在宁波乘坐公汽竟能拎包提袋上上下下而分文未付。心中准备着若遇不测，便力陈外出写生财力不支作为最后争辩的底牌以博同情。如今想来，很是搞笑。

此行画写生多少已不再记得。出发前贴身揣有人民币 50 元，回家后里里外外掏出各种票据一一清点核账，尚余数元。至今想起颇为自得。

如今鲁虹已是美术批评名家，思维敏捷，关注时代，著述颇丰。我赴外公干或出席展览研讨学术，经常两人相遇。想当年读书时他随身携带有小本见缝插针不停地记下什么，十分用心。今日得此事功，亦是自然。

（七）

班上十六名男生曾经合住过一间教室，日后谈资中相当多的趣事与这段日子相关。记得春夏之交，寝室内隐隐有异味萦绕，即令是大扫除也无法除去。嗅觉灵敏者终因不堪忍受，使用鼻子做

近乎零距离排查，终于在一上铺垫褥夹层内截获布袜一双。袜底纳有手工布垫，已不知多久未洗濯，类似腌制品浊味混杂相当刺鼻。想来袜子主人懒于洗换而以此法用于下次换穿，此君名刘寿祥。

还有惊人一幕，常被提起。国画临摹课，老师携一长卷《八十七神仙卷》示范，画作为老师 20 世纪 60 年代广州美术学院毕业时耗时三月完成，笔笔不苟。我们缠着老师争相要临摹，信誓旦旦妥善保管，弄得老师都不好意思叮嘱更多。我们极力想要分辨细密绵长的线条究竟，试图满足挑剔老师线描技法的好奇心。展开画卷细细读来，十几米长的画卷无一败笔。大家心服口服，遂将范本展开在靠墙拼好的画桌前对临开来。一日上课，寿祥执瓶往盘中倒墨，瓶颈孔小，



1980 年读书期间同学合影，左起鲁虹、刘成春、郑强、徐勇民、刘寿祥

几次挤压未见墨汁滴出，不由性急，用敦厚的双手用劲一压，霎时，冷光一闪，身为名品、号永不褪色的中华墨汁，像机枪横扫一样叭叭叭叭喷射到倚墙的画卷上，墨点越拉越长、越浸越深——画室里旋即无声。片刻，大伙才会过神来，手忙脚乱收拾狼藉。

次日，老师出现在画室，面对的是一群几乎噙着泪珠却分不清谁更悲寂的同学。大伙甚至设想出了老师作出最严厉反应的结局，不忍正视老师目光。班长用像是念悼词的语调，避重就轻简要复述了事件经过。谁都注意到了主语用的是“我们”，这番台词显然已经过刻意准备。其实，谁都知道这是老师的心血之作，心底里不合时宜地生出当年八国联军对付圆明园艺术品的肆虐感。多年以后，每谈及此事，方体味出心在流血是何般滋味。还从没听说过有过这样一种以无意的行为玷污艺术品的行为方式，令人心碎；更没听说过用集体担当来释缓个人巨大压力的救赎方式，令人感佩。

寿祥次年毕业顺利留校任教。作画待人极为周详细致，今已是水彩画名家，执教课程以特色胜出，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2009年珠海一次聚会，见到了退休已居粤多年的老师。时隔30年，我到底忍不住欲再释前嫌而旧事重提，老师只平静地说，后来，他又按同样尺寸画了一幅。我半晌痴痴无语。

（八）

王祥林，男，伶牙俐齿，白皮嫩肤，红唇看起来很是夺目。眼镜片总是一闪一闪，看不清瞳目盯在何处。此君作画，无论习作还是创作，画面温情缠绵。那会儿，台湾校园歌曲流行，与时风不同，常可从他口

中听到几段京剧，字正腔圆，眉飞色舞，虽擅老生，听上去总有点青衣般如泣如诉。此君今已是大武汉知名票友。

虽生得书生模样，戏语横生，祥林却好打抱不平。看战争片子，尤惧酷刑血腥镜头。每谈及此，必大声恳嘱诸友，倘生于一一起揭竿闹革命年代，务请大家念其性好激奋冲动，实则胆小恐多生事，好生生的躯体实在经不起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一类酷刑，若是招供，到那时休得责怪对不住同志们了。但凡日后再看酷刑拷问镜头，总不免想起祥林感言。

还记得篮球比赛中，他半场处便将球硬从对方球员手中夺出，紧揽怀中，球不再落地，口中念念有词，一路碎步直奔篮板下，双手投篮将球掷出，其超常动作，被戏称“八步上篮”。

祥林家居汉口。租界老宅，梧桐林荫，里弄里的竹床、衣架，老式唱片机里的单声道唱音懒洋洋飘出窗栏，早晨乘车隐隐可闻的雪花膏香味……一一用优雅的俚言俏语，让他形容活了。最让人忘不了的是他坚称——没有TAXI的声音，晚上哪里还睡得着觉？言罢，家不住汉口的同学只能嘿嘿愧疚陪笑。他读书几年蜗居武昌，真委屈死了他。

祥林访学欧洲后，画风一变，朦胧里间或生出精微，令人喜爱。他热心组织沙龙、策划个展，有咖啡味香的地方，多可见到他。无论何种场合，他必成话题中心，各色俏语必可让身边人捂肚俯身笑岔了气。

（九）

学生宿舍，和全国所有大学一样，上下铺位。我分得上铺，睡在下铺的是班长，

络腮胡子顺着他方正的下颌骨抹开，有些像战争片中抽着旱烟、处事公允、待人爽直、极有心计的老班长。况且，他还就是一名党员，善于知人，给人很强的信任感。也因这身份的信赖，学院图书馆老师拗不过我班强烈要求，嘱他戴手套一人翻阅外币购得的日文版《世界美术全集》，全班十八位同学得以集体赏阅。

与当时文学作品中班干部形象不同，班长喜欢开些玩笑，调侃中兼狡黠。一群人说着闲话，只要班长盯着谁看，嘴角扯起微笑，调笑的对象就是他了。班上凡有事端兴起，只要他扔出几句话语，所涉人事，懊恼者更加懊恼，愉悦者更加愉悦。班长男儿血性，不容同学吃亏。读书时，曾率众怒捣殴伤校友的瘪三混混住所，其“义举”令我班形象飙升。整个班风几年来有一种在其他班上未见的吸引力。

班长住武昌水果湖，家境亦好。逢周日晚返校，必带些家常小菜，大伙哄抢之后还抹嘴不停地埋怨太少了太少了。一次，他自家中捎带系成索状的海带，想必定在高汤中滂湃，滑润可口，咀嚼中的香味，至今仍可在唇齿间回味。我曾在返汉省亲时与他相约东湖晤面，其母相随，重提往日贪嘴事，惹得老人家乐不可支。

班长魁悍模样，三餐食素。猜想自幼吃荤隔了食，弄得他直至今天凡遇东道盛意设宴，餐桌上须不断地向好问者解释非宗教信仰束成的饮食习惯。班长嗜烟，夜闌熄灯，可闻得叭哒叭哒的吸拔声，薄烟顺蚊帐浸漫至我枕边，昏昏渐睡已成常事，迷迷中不知已有些生活阅历的班长在想些什么。

一场书读下来，同学封班长雅号“龙井”，意指其言谈人事直击要里，似酹茶寡一番肠胃后可细细生津回甘。十几年前，班



刘寿祥（左）和吕唯唯读书时留影

长将当年化装舞会旧照喷绘印出邮寄诸友。一旁随意写划出“龙井”两个大字，显然是用久置墨干未及清水润开的毛笔信手写出，恰如班长平日作画写字皆视作平常事举重若轻一般。毛茬茬的字令人想起他满腮刺猬般的胡须。

毕业后，他在内地及南国主事出版社多年，常念及师友，情深如故。后来相见，过去咧嘴满脸状似五线谱的沟槽竟光滑了许多，只是鬓角花白了些。

他叫吕唯唯。

（十）

集体生活，多有这样的人物，像当年可以公开传阅的小说中的进步青年一样，激

越、自律，又兼小布尔乔亚情调，自引得大家注目。我们班上就有这么一位像是书中走出来的人——郑强。

他有过当搬运工的经历，崇尚刻苦奋斗，常独处多思，无论绘画或是文学，尤喜经典，孕育了他期望的种种可能。愤世嫉俗、耿直持恒已融入他骨子里，创作表达多与平民和力量相关。至今仍能记起他毕业创作《光明之路》的画面。今天，已是身居南国的国画名家，创作题材也一任都市色素浸染，弥漫开来。

多年前，我赴开普敦中转香港，途经鹏城，仅数小时，他妥贴安顿引指，看画室，进午餐，尚能在客舍小寐，也一同短暂忆起往事画面唏嘘时光。

入学时，郑强携有一把小提琴，琴盒上的磨损可看出年头。但极少见他执弓，想来是自认应在集体生活中律己，或是觉得乱哄哄住在一块远不像期盼中应有的情调那样吧。

当时大家真的像玩命一样用功，每天作画、争论、不忘打趣，与时间抗争。曾遭“文革”冷落的小资情调难免时时憧憬着，希望移植到生活中来。他喜爱大声朗读本就应该大声朗读的诗句，内容多半是志向激越、意绪高昂、让我们听起来也不自觉地看不起风花雪月一类的呻吟句子。郑强生活极有规律，四肢肌肉坚实有力、紧绷绷的，长裤上隐见刀口似的笔挺折缝。早上大伙懒洋洋地起床时，他晨练已毕，挺直了身板从门外进来，脸色红润，目光炯炯，扫视室内混浊的空气和几乎是整体凌乱的环境（除了他洁净的床铺外），相形之下的猥琐感，想必当时许多同学都一定会有。

他的沙市口音常被大伙模仿。有时高声朗读名诗名句时，哪怕夹杂一丝语调的差

异，也极易遭刻意挑剔的同学放大逗乐。唯有一句名诗，他诵读的语调极为纯正，是他喜爱的俄罗斯大家普希金名句：“……那过去了的将变成亲切的回忆。”——哦，这一切，也成为了我亲切的回忆。

一群群学生、一拨拨老师，就这样依着昙华林前街后坊，年复一年，看日落日出，看四季更迭，看聚聚散散，一代一代的梦萦绕着壮志和愁情。如今昙华林校区的蓬勃气象不尽生机，在城市版图东面28公里处汤逊湖畔的藏龙岛校区已见端倪。

近年陆续写了些纪念或怀想的文字，心中仍不免觉得如同正餐吃了还未品甜点，不由将昙华林的一些事从记忆中拉了出来，凑成一席，方觉有滋有味。此篇专拣读书时同窗三两趣事，嘻笑一番，写来自然也轻松。一动笔，才发觉故事原是写不完的，更多的人或更多的事待留在日后应景，定会添色不少。想想，也就打住了。2020年时逢母校100周年，我尤其期盼这篇文章描写的岁月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看到。因为他们今后是可以让“红心随雨”，可以让“青山着意”的一代。

（徐勇民：湖北美术学院原院长。文章有删节）